

第 8 章

政治人類學一甲子：取向與課題

方孝謙／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從西元2000年的角度，觀看英、美政治人類學的學科發展史，大概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界，分為「前史」與「正史」。前史的部分，主要涉及社會人類學者如何在與大英帝國殖民官員互動的過程中，圈畫出殖民社會原住民的研究議程，Joan Vincent 特別在她的鉅著中，稱為「人類學的政治」階段。¹本文所關心的是前史以下，正式在英美大學佔有課程、教席的政治人類學發展史。在這一範圍，我們首先注意到，二次大戰以來六十年間，以理論取向來分，政治人類學歷經了以結構功能理論為基礎的體系論取向，以及反體系論的過程取向兩階段。雖然一則以鉅觀的系統，另一則以微觀的個體做為分析單位，兩種取向與文化的結構功能理論仍然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這兩種取向也主要為英國的政治人類學者所採用。

到了七〇年代，美國學者吸取拉丁美洲學者解釋其殖民時代政經發展的「依賴理論」，以及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生產模式」，而創發了「世界體系」取向。政治人類學的研究途徑因而有了極大的轉變：方法論上如何在世界體系的架構中有機結合鉅觀系統與微觀個體的分析-所謂「構連」(articulation)問題；實質研究上如何處理第三世界「小農」或對資本主義進行革命，或與之並存的問題等等。至此之後，政治人類學的議題呈現多樣化的發展。限於篇幅，第三取向之後，我們集中在八〇、九〇年代「邦國形成」(state formation)研究的討論上。因為在這一議題當中，我們發現政治人類學者與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的比較政治學者，有共同-譬如對「市民社會」--的關懷。而探索兩個學科的可能對話，也彰顯了政治人類學在跨進二十一世紀的主要特色：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網路化的

¹ Joan Vincent,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Vision, Tradition, and Trends* (Tucson, Arizona: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0).

世界體系中，著力增強不同文化社群合作、互信的基礎。

在四大取向的評介中，爲了避免浮泛，我力求討論每一取向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文本。譬如，在體系論取向中討論非洲政治體系論文集；²在過程取向中討論 Victor Turner 的著作及 Abner Cohen 的雙向度人；³在世界體系取向中討論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現代世界體系及 James Scott 的弱者的武器；⁴在邦國形成的議題中，則討論 Guillermo O'Donnell 的現代化與科層威權政體及 Clifford Geertz 的國都（Negara）等。⁵進行主要文本的評介，一方面當然是對文本所帶來有重大影響的議題，可以較深入的探討；另一方面卻也由於篇幅的嚴格限制，我必需割捨別人認爲非討論不可的著作-我深感遺憾的，就是在討論邦國形成議題同時，再無空間展示政治人類學者近二十年來對民族主義的研究。遺珠之憾，我們只能等待本書再版時，伺機彌補。

讓我們揚帆啓碇，航入政治人類學「正史」的大海。

一、非洲政治體系及其影響：1940-1960

非洲政治體系出版於 1940 年。它代表了英籍非洲人類學者以其田野資料與結構功能理論（structural-functionalism）緊密對話的結晶，也宣示了比較政治制度學者從搖椅走入實地觀察的開始。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本論文集所以會引起密集討論，而被譽爲政治人類學的奠基之作，⁶實

² Meyer Fortes and 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 eds.,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KPI, 1940).

³ Victor W. Turner, *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Drama, Fields,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Abner Cohen, *Two-Dimensional Man: An Essay on the Anthropology of Power and Symbolism in Complex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⁴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⁵ Guillermo A.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 Clifford Geertz,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⁶ Frank McGlunn and Arthur Tuden eds.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Behavior* (Pittsburgh, Pa.: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1), p.10.

在是由 A. R. Radcliffe-Brown 寫的序及編者 Meyer Fortes 與 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 合寫的緒言而來。在序中 Radcliffe-Brown 以散文筆調，寫出他的結構功能論如何適用於非洲政治體系的分析，並定義了何謂「政治組織」；本文遂引來諸多對功能論的重要預設-均衡說（equilibrium）--的詰難。兩位編者的緒言，則建構了對非洲政治體系的分類（邦國（state）/ 世系群（lineage）/ 親屬（kinship）三型社會，後兩種又合稱為無邦國型社會），Evans-Pritchard 更進而提出所謂分支（segmentation），或稱分裂與融合（fission and fusion）原則做為兩型無邦國社會的演化機制。不管是三種類型或是分支原則，都引起許多學者，特別是政治學者 David Easton (1959)，的熱烈討論。⁷以下我們就依序與緒言次第，分析非洲政治體系的歷史遺產。

Radcliffe-Brown 定義「政治組織」如下：「[它]是社會這個整體組織中，主掌武力的控制與調解的層面」。⁸而在用人類學的特殊工具-比較法-來研究政治組織時，「我們應注意...個體如何群集成為地域性或世系群團體，也應注意個體如何遭到他們的社會角色...或社會階級的分化。」⁹他接著縷述在「群集」的層面，應分析法律、復仇、戰爭這三種程度遞減的武力控制制度；而在「分化」的層面，則應分析政治職位（office）及不同形式的政體（如，老人政治）的分化。

人類學者在 Radcliffe-Brown 看來，不應以比較上述的「群集」與「分化」的政治組織課題為滿足，而應該以這部分的研究心得彰顯不易直接了解到的「社會這個整體組織」，也就是社會結構。他進而認為社會結構應被視為「均衡的狀態，其維持只有靠[內部]不斷的更新，就像活著的有機體靠的是體內生理化學物質的恆定一樣。」¹⁰社會結構的維持，依賴諸如政治層面的群集與分化過程的不斷更新。而這裡立論的根源，則來自生物有機體的類比。

⁷ 此處所引專有名詞的中譯，乃參考蔣斌，「人文主義的社會人類學家 伊凡·普理查」，黃應貴編，*見證與詮釋：當代人類學家*（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81 年），頁 229-231。

⁸ A. R. Radcliffe-Brown, "Preface," in Meyer Fortes and 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 eds.,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KPI, 1940), p.xxiii.

⁹ *Ibid.*, p.xxii.

¹⁰ *Ibid.*

在短短的十三頁序文中，Radcliffe-Brown 流露的對結構功能論的執著，是與他視該理論為他平生志業一貫相通的。¹¹但是，「社會結構依組成分子互動達成均衡來維持」這個預設，在人類學界與政治學界都是眾說紛紜，而傾向負面的評價。不過，讓我們先檢視補強的說法。

政治學者 Chalmers Johnson 利用 Talcott Parsons 改良過的結構功能論，重新論述社會的「恆定均衡」(homeostatic equilibrium) 如下：

它完全依賴各種[社會]過程的存在與穩定。而這些過程旨在完成社會體系的機能要件 (functional prerequisites)，也旨在武力之外，解決特殊文化處境下可預期會產生的一系列問題。¹²

所謂的功能要件，Johnson 指的是 Parsons 的 AGIL 說。¹³他同時把社會過程滿足功能要件、解決文化問題的機制，概念化為社會價值與分工環境的同步化(synchronization，也就是整合)；他說：「體系的恆定，是由共享的價值以及價值對特定[分工]環境的影響所共同決定。」¹⁴譬如說，戰前的日本人透過社會化的過程，把「忠君愛國」的價值內化為個人的工作倫理。此例大概符合 Johnson 這位日本專家所說的體系運行模型。

Johnson 的恆定均衡說似乎改進了 Radcliffe-Brown 的均衡假設，因為前者更明確的提出了價值與分工整合的機制。但是，這裡的改進並無法泯除對結構功能論之均衡假設的兩大批評。首先，這一體系模型必須連帶預

¹¹ 陳文德，「結構功能論大師 芮克里夫布朗」，黃應貴編，*見證與詮釋：當代人類學家* (台北：正中書局，民國81年)，頁84-140。

¹² 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ary Change*, 2nd e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56.

¹³ 帕森斯的AGIL模式，是對小至生物有機體，大至世界文明的系統性想像。他認為，任何這樣一個系統的存續，都必須滿足適應 (adaptation)、目標完成 (goal-attainment)、整合 (integration)、完形維護 (latency，或pattern-maintenance) 的基本功能。以社會系統而言，它分化出經濟部門處理人群與外在自然環境的交換關係，屈以滿足社會的適應需要；同理，有政治部門以權力分配滿足完成社會目標的需要；有[公民]社會部門滿足全體的整合需要；也有文化部門滿足世代交替的傳承需要。而四大需要或功能的產生，卻是社會這個有機體自行運作的結果：社會面對內部與外部的環境，同時它的行動預設手段與目的兩個範疇，環境的垂直軸（由下而上分內外）與行動的水平軸（由左右分手段與目的）交叉結果就產生AGIL四個象限：即外部環境與手段交接而生適應的需要；外部環境與目的交接而生社會目標的需要；內部環境與目的交接而生整合的需要；內部環境與手段交接而生文化傳承的需要。帕森斯的晚期弟子 (Edward O. Laumann) 因此認為帕森斯繁複的社會理論，其實是由有機體與環境互動這個簡單的中心意象出發的。

¹⁴ Johnson, *op. cit.*, pp. 55-56.

設社會成員都是「文化蠢材」(cultural dopes)，他或她只能被動的接受社會價值的模塑，以完成體系均衡為職志，而不能主動的操縱價值，以滿足個人名、利、權的私慾。我們下節討論的過程學派，可以說就是針對此一「文化蠢材」預設的不滿而崛起的。

其次，持結構功能論研究政治現象的學者，總是「武斷的」認定政治是社會維持其內部均衡的重要手段。¹⁵這裡的批評，就跟質疑 Parsons 為何設定 AGIL 為社會存在之必要條件是一樣的。而進一步檢視 Radcliffe-Brown 或 Parsons 的思想，都可以發現他們都是用社會乃是一有機體的類比推理，來建構社會如何自存的理論。儘管類比是人類使用語言以已知物曉諭未知物的重要原則，就如「人比黃花瘦」用了屬人的「瘦」的性質來比喻花，但是，這並不意謂花真具備了胖瘦的性質。適用有機體的特性，多大程度能適用社會，這是超出類比推理本身能回答的範圍。強說 AGIL 是社會均衡的要件，就不免遭來「武斷」之批。

在**非洲政治體系**的緒言中，兩位編者首先把非洲社會分為三類：邦國/世系群/親屬。邦國型社會主要是指這種社會有其行政組織。世系群型是以世系結構作為政治體系的框架，而世系結構則是「恆久的單系繼嗣群(unilateral descent groups)的分支體系」。最後，親屬型是指政治關係與親屬關係合而為一的小型社會，而親屬體系則是「個人透過短暫的雙系家庭(bilateral family)與他人或特定社會單元連結的關係整體。」¹⁶後兩型社會又合稱無邦國社會。三型分類中，對親屬型社會的討論有限，全書也沒有提供相關的田野資料。再則，分類的標準，也不符合 Radcliffe-Brown 對武力控制與調解的重視。事實上，Fortes 和 Evans-Pritchard 討論邦國型與世系群型社會的分野，依據了八種標準：治理單元、人口、生計、領土、武力平衡、武力功能、對殖民統治的反應、有關權位的價值。他們是以田野資料為基礎進行有系統的比較。

¹⁵ Anthony P. Cohen, *The Management of Myths: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in a Newfoundland Community* (Newfoundland: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1975), p.4; Ronald Cohe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J. J. Honigmann, ed., *Handbook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3), p.867.

¹⁶ M. Fortes and E. E. Evans-Pritchard, "Introduction," in 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 eds., *op. cit.*, p.6.

就**非洲政治體系**書中的田野資料來看，Max Gluckman 討論南非的祖魯族，無疑是屬於邦國型社會，而 Evans-Pritchard 所論蘇丹南部的努爾族，則屬世系群型社會。Gluckman 在討論祖魯人近代兩個時期的邦國組織時，已可預見他要揚棄結構功能論中的同時性分析，而帶進貫時、衝突面向的研究風格。比較祖魯人接受莫盤王(King Mpande, 1838-1872)及英國殖民政府(1888-1938)的兩段統治，他發現祖魯的邦國體系維持不變：國王→酋長→區長→世系群及田莊的首領。而在不同的統治期間，部落對抗部落或者部落對抗區的情形也維持不變；連帶的人民要效忠不同層級領袖而生的衝突情緒，也沒有改變。唯一有改變的，是「保有自身價值及重要性的舊組織，會影響把舊組織吸納其中之新組織的運作。」¹⁷於是他得到邦國體系在莫盤王時代是穩定的組織，而在殖民時代卻不穩定的結論。雖然強調歷史的及衝突觀點的分析，在本文中 Gluckman 並沒有理論化邦國體系的衝突來源。

理論化的工作，則見諸於 Evans-Pritchard 同書中論努爾族的世系群政治組織的論文。他認為努爾人的社會生活，強烈的受到蘇丹南部乾溼季各半年的生態影響，而他則從努爾人社會生活中的部落、世系群、及年齡群(age-set)型態中，歸納出他們的「政治結構：[包括]一個領土體系內各領土分支之間的關係，以及[領土體系]在整個社會結構中與其他社會體系的關係。.....[這些關係]構成分裂與融合的體系」。¹⁸在同年出版的努爾人書中，他進一步說明分裂與融合，又稱為分支原則：「政治群體間的分裂與融合是同一個分支原則的兩面；一個努爾部族和其下的劃分單位，就可以被視

¹⁷ Max Gluckman, "The Kingdom of the Zulu of South Africa," in 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 eds., *op. cit.*, p.53.

¹⁸ E. E.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of the Southern Sudan," in 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 eds., *op. cit.*, pp.295-296.

為這兩種矛盾又互補的傾向所形成的一個均衡體系。」¹⁹用 Gluckman 的話說，這個分支原則，是「融合小組以對抗上一層團體的過程，也是上層團體不存在時，小組再分裂的過程。」²⁰

Evans-Pritchard 以分支原則來解釋世系群社會的政治結構，這種說法引來後繼學者許多的討論。我們且以二十年後政治學者 David Easton 比較有系統的批評為核心，描述自**非洲政治體系**出版廿載之間，政治人類學思維的變化。Easton 的批評首先指出，以分支原則作為世系群社會的政治特點實在是找錯對象：「任何社會」的政治特色都在該社會「制定及執行具約束力決策的能力。」²¹易言之，Easton 一方面關心的是決策形成的政治行動（political action）的本質。而另一方面也試圖提供一個大理論以整合微觀的政治行動及宏觀的政治體系。

在 Easton 看來，政治體系能產出具約束力的決策，端賴五種政治行動：需求之形成、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對政府、憲制、國體三個層次不同的支持。²²其中不同的支持行動，是特別關鍵的。因為這些行動一則與政治體系中的三層次緊密相連；再則把行動加上所謂的外在分支原則，又形成區分不同政治體系的重要標準。²³

進言之，Easton 認為 Fortes 及 Evans-Pritchard 以現代政府的有無，作為邦國型與無邦國型社會的唯一分野，這是他不同意的。²⁴反而他試圖融

¹⁹ 引自蔣斌，「人文主義的社會人類學家 伊凡·普理查」，頁 231。努爾人出版後半個世紀，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 Douglass North 摘錄了微觀的賽局論者，研究無邦國型社會的心得：「[這種]社會的秩序乃是密集之社會網路的產物。人們在[網路]中親密地瞭解彼此，而且暴力的威脅因為會波及社會的其他成員，所以是維持秩序的永續力量。這種情況下偏差行為是不能被容許的，因為它會根本威脅到部落團體的穩定和保險互助的特質。North 此處所謂「密集之社會網路」，乃是指的賽局論者所稱的，人際合作所以可能的三條件：需合作的事項重覆進行，個人對他人過去表現掌握完全的訊息，參與合作事項的人數不多。要維持在無邦國型社會中的秩序，除了合作三條件之外，還要加上暴力威脅的第四個條件。見 Douglass North,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劉瑞華譯(台北：時報文化，民國 83 年)，頁 12，50，55。

²⁰ Max Gluckman, *Custom and Conflict in Africa*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5), p.8

²¹ David Easto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B. J. Siegel ed., *Bienni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235.

²² *Ibid.*, pp.227-229.

²³ *Ibid.*, pp.229-234.

²⁴ *Ibid.*, p.218，但筆者也無法同意 Easton 此處對 Fortes 與 Evans-Pritchard 分類標準的過度簡化。我們在正文中已指出二位編者的分類，無寧是有系統比較八類經驗資料得到的結果。

合 Evans-Pritchard 的分支原則與他自己的支持原則，以形成劃分政治體系的三大標準。他指出，這三大標準就是體系內所涉及分支類型的差異程度、各種支持結構的差異程度、及支持對象(政府、憲制、國體)的差異程度。²⁵至於這三個標準如何用於政治現象的劃分，Easton 在本文內並沒有涉及。

如果我們回想分支原則又稱為融合與分裂原則，我們就可以了解 Easton 真正的企圖，是把「融合」的部分一分為二個標準：由支持行動匯集成的結構及結構所施的對象-政府、憲制、國體。這樣一劃分是否就變成合理的標準，暫且不論；倒是標準之一的「支持對象的差異程度」如何適用於 Fortes 及 Evans-Pritchard 所看到的非洲政治現象，事屬可疑。即，在所謂無邦國社會中如何去區分現代的政府、憲制、與國體？其實，Easton 為了劃歸政治學者一塊專屬的政治層面，反而把政治現象不必要的侷限在現代民族國家的範圍。於是他就忽略了像 Evans-Pritchard 在部落、世系群、及年齡群中都觀察到相同政治運作原則的長處。時至今日，Evans-Pritchard 的長處反而得到後結構主義者如 Michel Foucault 的重視：Foucault 宣稱權力的毛細現象乃無所不在；而 Evans-Pritchard 努爾人的舊作，也重新被欣賞後結構主義的人類學者所引用。²⁶

從均衡預設到分支原則，**非洲政治體系**書中的理論源頭與經驗分類受到許多的批評。在這種情況下，結構功能論的政治人類學者逐漸把研究取向轉成個體政治過程的微觀分析。這種轉向其實在上述 Easton 試圖把結構功能論與政治行動結合時，已見端倪。而標榜微觀政治過程的曼徹斯特學派人類學，在 Gluckman 的領導下，從50年代開始就以歷史的、衝突的微觀分析逐漸取代了政治體系的典範地位。

²⁵ *Ibid.*, pp.230-234.

²⁶ Clifford Geertz,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49-72; Renato Rosaldo, "From the Door of His Tent: The Fieldworker and the Inquisitor,"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88-93.

二、政治行爲的過程分析：1954-1974

對於過程分析取向的評介，我們限定在 1954 至 1974 年的二十年間。以此爲限，不單是因爲從 Edmund Leach 在 1954 年出版緬甸高地的政治體系算起，我們要討論的過程分析之文本都落在二十年的闕限中；也是因爲在 1974 年 Immanuel Wallerstein 出版了**現代世界體系**第一部，從此調整了政治人類學的分析取向，使得過程分析必須與宏觀的結構功能論，又稱體系分析，有更精密的理論契合。74 年以後的過程分析學者所遇到的理論迷障，遠超出先前學者的想像範圍。

在二十年的期間內，我們主要討論兩位從體系到過程分析的過渡人物：Leach 與 Gluckman，以及三位過程分析的代表人物：Victor Turner（以社會劇，social drama，分析而著稱），與 Turner 同出 Gluckman 之門的 Abner Cohen（以分析政治象徵著名），及與曼徹斯特學派無關的 Fredrik Barth（以交易論，transact-ionalism，也就是理性抉擇論而聞名）。而不管是那一位作者，他都傾向使用一套攸關過程的辭彙來分析政治行爲：時期（phase）、場域（field）、脈絡、元素、歷史、闕限（threshold）、運動、方向等等；而這套語言的中心意象則是歷史事件及其脈絡。顯然這套辭彙是與體系論的辭彙有別，後者用的是：階段(stage)、層次（level）、環境、變項、演化、扣動（trigger）、回饋、整合等等，而其中心意象則是機械或是有機體。²⁷從對曼徹斯特學派及 Barth 的評介當中，我們一則可以理解他們提供分析政治文化的學者，新的概念語言的豐富程度；再則也理解如何銜接「微觀—過程」與「鉅觀—系統」兩層面的分析，已經成爲過程取向學者的燃眉之急。

緬甸高地的政治體系是討論緬甸東北山地中喀欽（Kachin）族人的認同（identity）問題。如果我們把認同狹義的定爲「同一」之義，那麼回答 Leach 的問題就可能被簡化爲「喀欽人=□□」的型式。事實上，Leach 的回答卻是，所謂「同一」指的是他發現喀欽人共享同樣的儀式語言，但是

²⁷ Joan Vincent, "Systems and Processes, 1974-1985,"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No.15 (1986), pp. 99-119.

語言中卻包含兩元對立的政治原則-強調等級的「昆老」(gumlao)原則與強調平等的「昆沙」(gumsa)原則。所以要回答喀欽人的認同是什麼,首先我們要了解這個認同具有「來回擺動」的特質。換言之,「昆老」與「昆沙」構成了喀欽人心靈上的「範疇結構」,而使得他們任何政治行動的後果,只能是「長時期在政治上的來回擺動」。²⁸發現這種週而復始的政治認同,Leach 認為正是他的著作的主旨:

對喀欽社會整體而言,「昆老」型社區有發展出「昆沙」型特徵的總趨勢,而「昆沙」型社區則有遵循「昆老」型原則而分裂成更小社群的趨勢。²⁹

因為喀欽的政治體系包含這種週而復始的認同特徵,所以 Leach 主張用「移動均衡」來代替結構功能學者的靜態均衡觀念。³⁰同時,他也賦予政治行動者驅使整個結構向另一政治原則移動的能力;他認為個人為謀權而競爭,或操縱個人在不同團體中的地位以換取政治晉陞,都是促使喀欽族群擺盪於「昆老」與「昆沙」之間的動因。³¹

運用並改造體系論的觀念卻又賦予行動者一定的動能,這就是為什麼 Leach 被視為是從體系轉向過程分析的過渡人物。但是,他成為過渡人物更重要的理由,還在他眼中的行動者,不管有多少潛力,他們行動的後果絕無可能改變結構的擺盪。這種對心靈的「範疇結構」預設了行動後果的看法,又使得 50 年代的 Leach, 成為從體系轉向 Levi-Strauss 之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 的過渡人物。³²當然,Leach 筆下既能競爭又擅操控的行動

²⁸ Edmund R.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54), p.xiii.

²⁹ *Ibid.*, p.227.

³⁰ *Ibid.*, p.xi.

³¹ *Ibid.*, pp.8-10.

³² Leach 後來在 1970 年寫成了膾炙英語世界的 *Levi-Strauss* (有黃道琳中譯,譯名結構主義之父·李維史陀)。結構主義人類學者宗仰瑞士語言學家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的結構理論。依哲學家 Paul Ricoeur 的整理,結構語言學的四大特徵為:(一)重視同時性分析勝於貫時性分析,因為系統比變遷容易捉摸。(二)適用結構分析的範例,乃由可清楚劃分的元素所組成的有限集合。(三)在此系統中的元素本身不具意義,它所具有的是與其他元素的差別。(四)在此系統中,所有的關係都是內生的,換句話說,語言系統是不假外求的:「話語」的範疇沒有存在的必要。見 Paul Ricoeur, *Interpretation Theory: 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 (Fort Worth, TX: The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5-6.

者，也因此難脫前述「文化蠱材」的批評。

傾向馬克斯主義的人類學者 Talal Asad，對 Leach 此文表現的「理想主義」有適切的評論。他認為 Leach 的寫法引發如下的問題：「人類學的文本如何可以替整個社會……建構一個整合的語義體系，而這個體系還可以替該社會定義什麼是它的根本認同。」³³ 尤有甚者，秉著相同的「理想主義」，Leach 在書中根本沒有探究「一則是歷史勢力和關係在一個社會裡的有系統聯繫，再則是這種聯繫所能支持或者侵蝕的特殊論述形式。」³⁴ 也就是說，Leach 的分析仍無法掙脫體系論以及後來的結構主義的同時性（synchronism）限制。

相反的，另一位過渡人物，Max Gluckman，在前述**非洲政治體系**書中討論屬於邦國型社會的祖魯族論文時，已帶進歷史貫時的、衝突面向的分析。但是，他和 Leach 一樣是在體系論的框架下發展各自的過程分析；也都試圖以自己的動態均衡觀念代替結構功能論者的靜態觀，所以兩人都被視作是過渡人物。而 Gluckman 的過渡性質，另有一特異之處：他有初步的過程分析的構想，甚至也提出了「社會場域」（social field）的重要概念，但是這些理念的落實和發揚光大，則有待他的傑出學生，Victor Turner，來完成。

Gluckman 花了一本書的篇幅來澄清我們現在稱為「動態均衡」的觀念。在**非洲的風俗與衝突（1955）**書中，他描寫了非洲社會裡五種具有矯正與補償作用的衝突-家族械鬥、事變、疏離（estrangement）、巫術、與儀式。這幾種衝突的嚴重程度不及革命，所以不會顛覆既存秩序，反而它們是構成現存秩序的一部分：

在某一層面的社會關係中，人們效忠對象之間的衝突，會導致長時間廣範圍之關係的和諧。³⁵

所以整個體系的和諧就看它的次體系是否存在衝突。[就像]父系親屬中的敵對團體之間，是由每一團體成員對母族、妻族、及本地的感情聯繫

³³ Talal Asad, "Anthrop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Ideology," *Man* (New Serial), No.14 (1979), pp. 607-627.

³⁴ *Ibid.*, p.616; Joan Vincent,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Vision, Tradition, and Trends* (Tucson, Ariz.: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0), p.272.

³⁵ Max Gluckman, *Custom and Conflict in Africa*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5), p.2.

所劃分的一樣。³⁶

儘管此處充斥體系、均衡的辭彙，畢竟 Gluckman 已經體認到分析個體行動過程的重要性。到了 1965 年，他寫道：

[曼徹斯特大學的人類學者]現在注重分析社會關係本身的發展，因為這些關係承載著世代變化、及新世代長成所帶來不同原則與價值的衝突。如果我們長期觀察這些關係，我們會看到各種團體及其支持者操控各式的神秘信念，以遂行他們的利益。而我們分析這些信念，是把它們放在每日社會生活的動態過程中，也放在新團體與新關係的誕生與昂揚之中觀察。

37

引言中 Gluckman 顯然輕視信念（視為手段）而重視利益（視為目的），這跟他的學生 Turner 強調的重點剛好相反。但是他著重在團體動態生活中了解信念如何實現利益，強調過程分析的用心無庸置疑。

在他為「曼徹斯特學派」開拓過程分析的途徑中，他模糊的感覺到「社會場域」是用來分析過程的有力概念。譬如，他曾解說這個概念是「由不同的社會力量所影響的.....社會團體與社會角色之間的關係。」³⁸而從他所舉的祖魯族的事例中，我們略可得知所謂「社會力量」是某段歷史間發生的幾個事件，而這些事件作用在不同團體內與外的領導人與被領導者的互動關係上。這個過程構成社會場域，而社會場域是跨實際的領土空間而存在的。因為他的概念只有「操作定義」（緊貼著實例來運用）而犧牲了邏輯上的謹嚴，如果不是 Turner 的拯救，社會場域可能無法成為政治人類學中的重要概念。

Turner 把社會場域的觀念融合在他所創的「社會劇」（social drama）一詞中，而「社會劇」則是他完整的過程分析裡，作為解釋社會事件的基本單位。所謂「完整的過程分析」，依照 Turner 的同窗 Abner Cohen 的見解，³⁹指的是對社會結構的四大制度-經濟、政治、親屬、儀式-全盤的動態

³⁶ *Ibid.*, p.20.

³⁷ 轉引自 Marc J. Swartz et al., "Introduction," in Marc J. Swartz et al., eds., *Political Anthropology* (Chicago: Aldine, 1966), p. 2.

³⁸ Max Gluckman, *Order and Rebellion in Tribal Africa*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63), pp.231-232.

³⁹ Abner Cohen, *Two-Dimensional Man: An Essay on the Anthropology of Power and Symbolism in Complex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21.

分析。其中，經濟、政治制度產出具有權力不等關係的現象稱為「事件」；而親屬、儀式則產出與事件呈辯證關係的「象徵」(symbol)。⁴⁰而Turner的分析模型，就是在點出同屬現象範疇的事件與象徵之後，繼續以脈絡、分析單位、過程等概念對兩者做進一步的分析。

以政治經濟事件的分析而言，它的脈絡是Turner所稱的「行動領域」。⁴¹在這一領域中，事件被分解為更小的分析單位-社會劇；而社會劇在時間上涵蓋特定的歷史時段，在空間上則又可分為「全國領域」(national field)與「地方情境」(local arena)。⁴²Turner定義「領域」為「追求相同獎賞或價值的行動者之間，所具有的全部關係.....」，而「情境」則是「在領域之內」，既是敵對互動的場合，也是明顯可知的框架(frame)，更是決策訂定的場景。⁴³社會劇在歷史時段中的開展屬於過程的範疇，概念上又可分為六大時期(phase)：起始的動員政治資本時期、破壞和平時期、危機時期、互斥趨勢勃發時期、動用適應與矯正機制時期、及恢復和平時期。⁴⁴因為這是概念上的分期，所以在實際應用上並不要求六個階段必須全現。簡言之，Turner對政經事件，尤其是歷史上的武力變亂，提供了描述、分析的工具。

相應的，Turner也以相同的概念範疇，為上述的事件與變亂，貢獻了分析其象徵意義的方法。象徵在文化的脈絡中，可分為工具象徵(構成整個儀式意義之一環)與主要象徵(本身為重要價值之所聚)兩種。主要象徵是Turner理論化的重點，它透過三種機制來凝聚價值：⁴⁵首先是濃縮作用，「許多事物和行動都用同一個[象徵符號]來代表」；其次是統一作用，透過使用象徵的人的「聯想」，主要象徵在特定時空下可具備統一的意義；最後是兩極化作用，主要象徵的意義通常是環繞在「感官」與「意理」兩

⁴⁰ 所謂辯證關係，簡單的講就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段，事件與象徵兩個變項可互為因果。以事件為例，什麼時候它成為象徵的因，什麼時候為果，則有待研究者詳細調查它所依附的歷史脈絡。而此處要介紹Turner的過程分析模型，正是有助於提供調查脈絡的概念工具。

⁴¹ Turner, *The Forest of Symbols*, p.43.

⁴² Victor Turner, *Drama, Fields,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40.

⁴³ *Ibid.*, pp.127-128 & 140.

⁴⁴ Swartz et al., *op. cit.*, pp.32-37.

⁴⁵ Turner, *The Forest of Symbols*, p.28 & p.45.

端：象徵之為物一方面刺激感官之慾求與感覺，另一方面則訴諸社會規範、道德的層面。凝聚價值、意義的三種機制明顯是在時間流動，也就是過程中進行的，這種說法尤其適用統一與兩極化的對立作用。但是，Turner也進一步指出過程的範疇，在通過禮（rite de passage）的儀式中特別顯著，這在早期法國人類學者 Van Gennep 對成年禮的三階段論-分離、過渡（Turner譯為邊緣化，margin）、結合-中就可看出（1967：94）。⁴⁶

Turner 利用十九世紀前葉，以墨西哥獨立之父為名的伊達哥事變（The Hidalgo Insurrection, 1810年9月16日起事至1811年3月21日被捕）為例，⁴⁷說明他的過程分析如何進行。⁴⁸伊達哥的社會劇，起始於事變三巨頭--伊達哥神父（第一代墨西哥生西班牙裔）、阿達瑪、阿葉德民兵隊長（出身同伊達哥）--在墨西哥中部葛列塔羅城一家俱樂部的聚會。他們在這裡暢談主權歸上帝或歸人民的啓蒙理念（動員政治資本時期），而當時殖民母國西班牙的國王費迪南，卻遭到拿破崙的廢黜而被拿破崙之兄約瑟夫取代（「全國領域」進入破壞和平時期）。這也是社會劇進入危機期的開始，因為三巨頭發現可以透過人脈以護王為名向西班牙總督奪權，來實行他們的啓蒙理念（「全國領域」與「地方情境」之聯繫）。1810年9月16日在多羅雷斯城的倉促起事，雖是短暫勝利的開始，卻也啟動了互斥勢力的運作-有政府官員而支持叛軍的，也有起初追隨伊達哥而終於反出的，更有第一代墨西哥生西班牙裔與第二代的對立等等。叛軍到了10月底已兵臨墨西哥城下，伊達哥卻決定躲避與守軍的交鋒。伊達哥的實力到了翌年1月中旬，與政府軍指揮官卡列哈的一戰就傾瀉如注了（動用矯正機制時期）。逃亡兩個月，伊達哥與阿葉德雙雙被自己過去的部屬出賣受擒，卒至槍決（恢復和平時期）。Turner 認為伊達哥事變是社會劇循六大時期發展的典型例子。

在這個事例中，Turner 也分析了幾個主要象徵：為什麼墨西哥以9月16日為1911年革命成功後的國慶日；伊達哥自命為「美洲總指揮」的象

⁴⁶ *Ibid.*, p.94. 三階段中的分離，指接受成年禮的人，需先從他的同儕團體中被隔離出來。他接受巫師祝禱及考驗的期間，是謂過渡。通過了巫師的儀式被成年團體所接納，則是結合。

⁴⁷ Turner, *Drama, Fields, and Metaphors*, pp.98-126.

⁴⁸ 以下人名地名的西班牙語發音，筆者感謝政大國研中心邱稔壤教授的指正。

徵意義；及伊達哥選「瓜達露培聖母像」作為軍旗之意義。讓我們以聖母像軍旗為例，說明 Turner 的分析手法。有歷史學者質疑，選「瓜達露培聖母像」是出於偶然，其實選「干地拉利亞聖母像」效果也是一樣。Turner 不同意，他認為除了聖母像本身就濃縮了「母親、母國、地母、本土文化」等意義之外，瓜達露普的聖母像是褐色皮膚的，而產出此像的塔伯亞，又是墨西哥原住民崇拜固有的托藍辛女神的地方。多了這兩層緣故，使得原住民在注視「瓜達露普聖母像」時，被挑動了從西班牙人手中解放的強烈慾求。換言之，此畫像訴諸兩極化的感官作用極強，而這正是伊達哥藉以號召印第安原住民起事的最佳武器。

在本文評介的政治人類學者中，Turner（以及他的師弟 Abner Cohen）恐怕是最擅於書寫分析「秘笈」（recipe）的作者，也就是長於系統化自己的分析手法。這與 60 至 70 年代另一位主要的象徵人類學者，Clifford Geertz（詳下）迥然不同。正因為 Turner 對理論架構與經驗分析的聯繫，說理清楚，我們可以趁此反省以詮釋象徵意義為主的過程取向，對政治人類學乃至一般社會科學的貢獻。就社會劇的六大時期論而言，Turner 一則提出「領域-情境」的一對空間概念，作為微觀與鉅觀分析的連結點，這當然是預示了政治人類學在世界體系理論衝擊之下的轉型。再則，以六大時期涵蓋任一政經事件的起承轉合，也提供了有用的描述範疇。可怪的是，強調過程分析時代的 Turner，尚未注意到事件的起承轉合，仿佛具有一種說故事似的「敘事性」（narrativity），而這種敘事性質對於參與事件之個人的身份認同，影響極大。⁴⁹如果能夠多一層認同意義的分析，應該只會更加增強他的理論模型。

就主要象徵的分析而言，Turner 的理論源頭來自精神分析學者 Freud 的「夢程」（dreamwork）。而就像精神分析師與他或她的病號之間，存在

⁴⁹ 敘事認同理論的發展，見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2nd ed. (Notre Dame, Ill.: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pp.204-225 與 Paul Ricoeur, "Life in Quest of Narrative," in David Wood, ed.,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20-33; *Oneself as Anoth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115-151.

治療（有權）者與被治療（無權）者的權力關係，Turner 的文本與他所描述的墨西哥原住民之間，也存在他為後者親身參與的事件詮釋意義的知識（等於權力）關係。問題是，如果原住民無法感受、不理解、或不同意 Turner 所詮釋的意義時，又當如何？總不能重視過程分析的學者，從後門又迎入「文化蠱材」的預設，而置原住民的反對於不顧。後期的 Turner 有無掙脫研究者—行動者權力位階的困境，還待考證。這種困境的覺悟已導致新一波民族誌（ethnography），重視「對話式」或「眾聲喧嘩式」（polyphonic）的寫作方式，即把人類學者倚重的報導人或採訪對象的話語，至少與作者所言佔據相同的篇幅而呈現出來。⁵⁰ Turner 的過程分析模型，在微觀-鉅觀的連繫，在敘事認同理論的興起，及在民族誌的書寫各方面，都站在承先啓後的關鍵。

其次，我們討論曼徹斯特學派在 Gluckman 與 Turner 之外，另一位大將，Abner Cohen 的政治象徵論。我們前面已提到 Cohen 對「完整的過程分析」的看法，這裡我們可以把他的認為如何在現代社會中，分析政治象徵過程的全貌，用圖一來呈現。⁵¹

⁵⁰ James Cliffor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43-51. 華人人類學者研究中國大陸的對話式民族誌，見黃樹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後的中國農村變革*（台北：張老師出版社，民國 83 年）。

⁵¹ Abner Cohen, *Two-Dimensional Man: An Essay on the Anthropology of Power and Symbolism in Complex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olitical Symbolis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US), No.8 (1979), pp.103-108.

圖一 Abner Cohen 現代社會中政治象徵過程的分析模型

	親屬制度	客觀化	自我
	象徵形構	正當化	個體
	儀式制度	神秘化	人類生存
社會結構	(文化遲滯論)		畫界
	經濟制度		傳播
	權力關係	團體	決策
	政治制度		權威
			意理
			紀律

Cohen 曾經說過：「規範性象徵基本上是雙聲帶的 (bivocal)，足以滿足存在的與政治的兩大目的。」⁵²以這句話對照圖一，我們了解 Cohen 所指，是一個社會的主要象徵透過客觀化、正當化、神秘化的過程，完成個體發展自我、理解集體為何存在的需求；也同時完成群體如圖一所示的六大功能。為什麼與權力關係呈辯證態勢的象徵過程 (Cohen 又稱之為象徵形構或行動)，可以同時滿足個體與群體的不同需要？以客觀化來說，如制服、迎新的象徵儀式，把個體在群體生活中的角色畫分得非常清楚。另一方面，這一象徵過程也賦予現代生活中，流於支離的各種角色之間一定的統整性。再以正當化來說，制服上不同顏色的肩飾或勳章，一方面代表了個體在職業階層中爬升的成就，另一方面也維持了長官對下屬的權威關係。最後，就神秘化而言，像精神講話、及至集體公祭，經常有化解個人之間、部門之間心結的作用；透過集體「死生之事亦可謂大矣」的嘆喟，怨懟消解，社群感油然而生，群體的紀律也於焉增強。

⁵² *Ibid.*, "Political Symbolism," p.102.

除了以三大象徵過程對個體與群體的需求做功能分析之外，Cohen 還以別的「過程」解釋為什麼在社會結構變遷的情況下，⁵³象徵形構的變遷遠比權力關係來得慢，也就是解釋社會學文獻稱為「文化遲滯」(cultural lag) 的現象。⁵⁴首先是符號象徵因為意義模稜兩可而帶來的彈性 (flexibility)。這個彈性表現在：新的權力關係所需達成的功能用舊象徵就可以滿足，因為舊象徵的意義原本就不是固定對映於舊的權力關係。其次，個體適應新的社會變遷，並不需要馬上改變他所習慣的一套符號象徵；通常是他的下一代，面對與他差異甚大的環境，才會去創造新的象徵。第三，群體中不同的符號象徵有集成一個整合系統的傾向，而形成該社會的「世界觀」並侷限系統組成分子的活動。因此，即使某些組成的象徵發生變異，整個制度化的系統還是不會跟著改變。最後，社會主要象徵的生命周期大多長過社會變遷之前的穩定期，所以會餘存至變遷後的社會新情況中。

Cohen 解釋「文化遲滯」現象的過程理論，可以說乏善可陳。他所區分的四種「過程」中，既有象徵體系箝制組成分子的變遷，又有個體的需求不必用新象徵來滿足；結構功能的詞彙更是用得窮斯濫矣。而他所謂的象徵既有模稜的本質，又有極長的生命週期；獨獨他沒有提供解釋象徵這些特點的理論。但是另一方面，Cohen 區別三大象徵過程以解釋個體與群體的需求滿足，雖然仍然不脫結構功能的語彙，三大機制的明晰程度卻足以建立合理的因果假設，供後來學者的檢測。而且他以相同的機制同時解釋個體-微觀與群體-鉅觀現象的企圖，至少是值得佩服的。

對於宗仰曼徹斯特學派的人來說，有兩件理論工作似乎刻不容緩：一則是如何匯通 Turner 所謂凝聚社會價值的三個象徵機制（濃縮、統一、兩極化），與 Cohen 所謂象徵過程滿足個體生存與集體政治的三機制（客觀化、正當化、神秘化）；再則是釐清連結微觀與鉅觀分析的「全國領域-地方情境」概念，與象徵過程同時滿足個體與群體需求的命題之間的關係。至於 Turner 與 Cohen 留給分析政治文化的學者，極其豐富的概念語

⁵³ *Ibid.*, *Two-Dimensional Man*, pp. 36-39.

⁵⁴ William F. Ogburn, "The Hypothesis of Cultural Lag," in Talcott Parsons, et. al., eds., *Theories of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p.1271.

言，對能夠善用這批資產的人而言，應該是受益無窮的。

最後，讓我們評介另一種與曼徹斯特學派毫無關聯的過程理論-- Fredrik Barth 稱為「交易論」的過程分析。交易論的意義，根據 B. E. Ward 的權威性解釋，是這樣的：

它預設社會人類學主要卻常遭到疏忽的工作，是了解社會形式 (social forms) 和人們的行動中間制限與誘因的關係。Barth 為達成這項工作所發展的分析工具就是交易論-一個顯然是從經濟關係的研究中所得出的名詞，但現在則擴大指稱：行動者之間任何相互 (reciprocal) 的關係，這種關係的性質就是他們在互動之際，都想從中獲利且利益的獲得要大於或至少等於互動的損失。所以每次交易的結果就取決於抉擇的過程，也就是由社會「價值」所決定的特定脈絡中，一連串的決策。而經驗上所能觀察到的行為規律性 (即社會形式)，就等於是重複發生的結果的次數分布 (frequencies)，亦即行動者在接受所處社會地位的制限與誘因之下，進行極多的交易的結果.....⁵⁵

以交易論為分析工具，Barth 一方面要挑戰體系論者，Evans-Pritchard 解釋無邦國型社會的分裂與融合原則；另一方面也試圖建立個別價值如何形成整體文化的整合理論-也就是 Barth 對微觀的個人偏好如何連結成鉅觀的文化體系的見解。

Barth 認為，Evans-Pritchard 利用世系群的分支原則，雖然可以解釋非洲東北部努爾人部落的分合現象，卻不足以分析巴基斯坦西北省份阿富汗民族 (Pathans) 的情形。⁵⁶ 阿富汗人的政治體系像 Evans-Pritchard 所說的，重視父系繼嗣之間的分支關係，但是他們卻是利用這層分支關係來辨別土地利益上的敵我對立，結果產生血緣近的旁親反而分屬敵對團體，而不是如 Evans-Pritchard 所預測的近親結為共同體以對抗遠親的現象。Barth 提出三條規則以說明阿富汗人的互動「遊戲」是如何進行的。⁵⁷ 第一

⁵⁵ Robert Paine, "Second Thoughts about Barth's Models,"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London), No.32 (1974), p.5.

⁵⁶ Fredrik Barth, "Segmentary Opposi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A Study of Patnan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London), No.89 (1959), pp.5-6.

⁵⁷ *Ibid.*, pp.15-19.

條「零和規則」是指出現了利益上的持續對立。即在當地 *wesh* 土地耕種制度下，每一支脈的成年男性可集體得到土地耕種十年，但落實到支脈中每一「房」可分到那一小塊地時，交易論的獲利大於或等於損失的原則就開始作用了；這條規則決定了「一房所有即為另一房損失」（零和）是這一「遊戲」的本質。第二條規則是說「房」與「房」之間會縱橫擺盪，而形成大小差不多的兩個敵對團體。以五個「房」來說，會出現任三房聯合對付其他二房的現象，因為在稍多一房的團體中，每一房能爭到的土地價值最高；⁵⁸這是形成兩個敵對團體的「多數」（majority）規則。最後，是「煞車」規則，也就是說 *wesh* 既是規定了每一支脈每十年的土地總額，互相敵對的小團體不會憤而離開原屬的支脈，因為一離開下一個十年的土地總額就會減少，而別的支脈因為血緣疏遠也沒有收容出走團體的理由。因為存在這三條規則，阿富汗人之間就產生父系近親以兩個團體互爭土地的態勢。

以交易論取代 Evans-Pritchard 的分裂與融合原則之後，Barth 進一步用相同的理論解釋由武斷的、人為的個別價值，如何整合成文化的全貌。所謂整合，是指「現象之間顯現固定一致的關係而構成一個系統」，⁵⁹價值則是私人的偏好。如前所引，交易是行動者互動之際，從中獲利（且利益的獲得要大於或至少等於互動的損失）的過程。那麼透過交換價值不等的財貨及勞務，為什麼會出現統整的文化？這是因為不斷重複的交易行為，使得財貨及勞務背後的私密價值系統化與制度化了。⁶⁰價值會系統化，因為當人們面臨必須不斷在不同的財貨及與勞務間做選擇時，他們被迫必須發展出比較物料的標準，以抒解選擇的壓力；價值會制度化，也就是被人共享，則是因為在尋找比較標準時，我們寧願借助別人的經驗而不願償付

⁵⁸ 假設有 a,b,c,d,e 五房，而全部土地價值為 +1，那麼從 a 的觀點來看它與其他各房結盟的情形如下：

- a 不與 b,c,d,e 結盟，則 a 得到 -1 的土地價值。
- a 結盟 b 對抗 c,d,e，則 a 得到 -1 的土地價值。
- a 結盟 b,c 對抗 d,e，則 a 得到 +1/3 的土地價值。
- a 結盟 b,c,d 對抗 e，則 a 得到 +1/4 的土地價值。
- a 與 b,c,d,e 結盟，則 a 得到 0 的土地價值。

⁵⁹ Fredrik Barth, *Model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London: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66), p.12.

⁶⁰ *Ibid.*, p.14.

「嚐試錯誤」的代價。所以抉擇環境的制限加上個體「利益最大化、損失最小化」的心理，就造成大部分社會中無數主觀的偏好，透過貨幣的比較原則而整合成完整而彼此分殊的文化。

我們可以文化整合的解釋，分析上述阿富汗民族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之下，從完整的傳統文化過渡到現代文化的歷程。在傳統文化中，阿富汗的族長以免費的米飯宴饗族人以換取他們的效忠，而他們的忠心又成爲這個族長與別族爭地的資本，多爭到的地則可以生產更多的米以招來更多的扈從。所以，依 Barth 的研究，在這個文化中系統化而爲人共享的價值，就是「自主、武勇、財富、和好客」。⁶¹到了 1920 年代，此地出現土著國家與道路系統，導致族長的米可以運到米市去賣。市場化就帶來了傳統價值之間的矛盾：有的族長保留財富的價值而不再宴客，好客的價值就淡化了；自主的價值也會淡化（一旦族長選擇以國家的武力來保護他的田產）；但是國家也會拉攏各個族長擔任行政職位，從而使族長仍保有武力，也繼續重視武勇的價值。在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中，傳統價值於是解組，而經過新交易模式的整編剩下武勇和財富兩種相合的價值。當然這些價值又會與其他新價值整合，而形成當地的現代文化。

Barth 稱爲交易論的理性抉擇理論，可預見的招來體系論者，甚至是另一位過程論者 Turner 的批評。Turner 認爲像 Barth 解釋阿富汗人分支結盟的「遊戲」，窄化了在「地方情境」中所能看到的政治現象，因爲除了政客的操控能力之外，地方政治也包含了理想、利他、愛國心、犧牲奉獻等等因素。此外，引進「遊戲」規則以規範競爭行爲，Turner 認爲是有教育的中產階級的偏好。像他在伊達哥事變中所看到的，就全然不是中產階級雅好的紳士型競爭。他說：「遊戲[賽局]理論是詮釋某些紳士型競爭的絕佳工具，但有的社會變遷力能震垮維持社會穩定的前提與基礎，此時這種工具卻是全然無用的。」⁶²

接受文化體系論的人類學者 John Comaroff 及 Simon Roberts 也評道，Barth 認爲價值整合成的「文化」，是爲極大化物質與社會利益而進行交易

⁶¹ *Ibid.*, p.16.

⁶² Turner, *Drama, Fields,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 p.141.

的「結果」，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因為任何價值序列，包括極大化的價值在內，必須先蘊涵在文化之中，然後交易過程才能被視為具有社會意義-解釋了極大化物質與社會利益的動機。他們因此認為，「在任何民族誌脈絡下的分析，應先證明構成一個文化社會體系的原則[或序列]是什麼，再證明這個體系以什麼樣的意理形式銘刻這些原則，最後再證明這些原則令什麼樣的交易過程成為可能。」⁶³

最後，即使是亦步亦趨跟隨 Barth 的分析風格的加拿大學者，Robert Paine 也認為 Barth 忽略了交易過程中權力之為用。⁶⁴他引用與前述的學者 A. P. Cohen 討論的結果認為，權力之所以重要，因為它充斥地位階層之中，而這個階層使交易能夠發生；也因為它決定了所交換財貨的價值。簡言之，權力限制了交易的範圍，而有權力者能夠化交易為自己的資源。

後兩類的批評隱含的弦外之音，其實是前述 Turner 以「領域-情境」（或 Cohen 以象徵三過程）的概念，作為微觀與鉅觀分析連結點的迴響，當然 Turner 自己也提出交易論的分析必須以階級結構的存在為前提。而不管是階級結構、文化社會體系、或者是地位階層，三種評論都同意方法整體論（methodological holism）優先於 Barth 強調的方法個體論：即某種結構整體的存在使得個體的互動過程可被理解。在 Barth 把理性抉擇論帶入政治人類學之後，人類學者的內在評論一則認可了分析個體層次互動過程的重要性；但同時隱約的也強化了以下的看法：過程分析要有意義，必須預設文化或社會的結構整體的存在。而後一看法在 Wallerstein 世界體系理論的鼓吹之下，理應走上「無限上綱」的加強途徑，但是後續政治人類學的發展果然是這樣嗎？

三、馬克思主義取向的挑戰：1974-

二十世紀中期的政治人類學，是由英國出身的人類學者所發展出來的。他們在結構功能的理論範式影響下，針對異民族政治文化的鉅觀與微

⁶³ John L. Comaroff and Simon Roberts, *Rules and Processes: The Cultural Logic of Dispute in an African Contex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32.

⁶⁴ Paine, *op. cit.*, p.7; Vincent, *op. cit.*, p.360.

觀現象，以有機體的系統、均衡語言或歷史事件的時期、場域概念，逐漸開展出重視鉅觀現象的體系分析取向，及重視微觀現象的過程分析取向。但是在上節過程分析的評介中，我們看到如何連結鉅觀與微觀的政治文化分析，已成為多位過程分析學者的共同關懷。而一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對這一關懷也有簡潔的回應，那就是「構連」(articulation)的觀念：特指著現代資本主義，從十六世紀以來做全球性擴張的過程中，對泛稱為第三世界「國家」本土的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衝擊現象。為解釋本土社會的構連，這一派以法國人為主，被稱為「結構馬克思主義」的人類學者，倚重馬克思著作中提到卻沒有發揮的「生產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論。限於篇幅與筆者能力，對這一派尚未解答「歷史上到底有多少種生產模式」的理論，我們將透過美國學者 Eric Wolf 及 William Roseberry 的眼光做簡短的二手評述。Wolf 除了選擇性使用生產模式的概念外，他同時也是自 1950 年代 Julian Steward 始倡複雜社會的小農 (peasantry) 研究以來，美國人類學界研究並理論化小農政治行為的泰斗，流風所及也影響到政治學者在冷戰期間對東南亞小農的「道德經濟」與「政治經濟」研究。⁶⁵這一部分的評介，我們置於本節的後半進行。

相對於構連的觀念，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社會學者 Wallerstein，則強調現代資本主義的擴張，是以強國對弱國的不等價交易（如以高價的工業產品交換低價的農業產品），「整合」(integrate) 弱國而置之於資本世界體系的「邊陲」地位。Wallerstein 突出交易與整合的觀念，這是與結構馬克思主義學者重視的生產與構連，截然不同的地方。所以，本節的評介將依世界體系、生產模式、及小農研究的次序進行。首先，評介 Wallerstein 的理論要旨及引起的批評如下：

Wallerstein 從社會體系的概念出發，把世界的發展歷史分成三大階段：首先是「迷你體系」階段，泛指狩獵、畜牧、或簡單的農業社會中有自足的分工經濟及單一文化架構者。⁶⁶他先以經濟史家 Karl Polanyi 有名的「相互經濟」(reciprocal economy) 概念指稱迷你體系的經濟特點，後來則

⁶⁵ Eric R.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⁶⁶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Essays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5.

改稱迷你體系為「糊口經濟」(subsistence economy)。⁶⁷其次是「世界帝國」階段，如中國、埃及、羅馬，都擁有單一分工經濟及數個文化系統，而與第三階段的「世界經濟」最大的不同，在於世界帝國尚擁有單一的政治（也就是「帝國」）體系。世界帝國及世界經濟合稱為「世界體系」，而最後階段的現代世界經濟也稱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個發源於十六世紀以歐洲為中心的經濟體乃 Wallerstein 分析的重點。⁶⁸

經濟層面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透過資本累積和不等價交易，在空間上不斷產出與複製核心、半邊陲、與邊陲國家的分工狀態；又透過體系本身「擴張」與「緊縮」的循環運動，在時間上造成經濟成長率呈波浪狀的時高時低態勢。政治層面上，自十六世紀以來歐洲強國與弱國的演化，就與經濟上核心、半邊陲、與邊陲的分工形成互相增強的狀態；另一方面，民族強國的形成與世界體系整合全球生產的兩個原則是根本矛盾的。世界體系與族國形構的緊張，正是 Wallerstein 分析的著眼點，而在這裡半邊陲國家有其重要性-政治上做核心與邊陲國家的中間屏障，減少核心國對邊陲國不等價的剝削，使邊陲國不致群起「叛變」；經濟上，半邊陲國家與另兩類國家搬有運無，而賺得它中等價位的工資和利潤；所以半邊陲的政治經濟作為，維持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完整。⁶⁹最後在文化層面上，世界體系包含了許多相互關連的文化社群-語言、宗教、種族、階級、乃至科學社群等等，直到最近 Wallerstein 才比較集中的以世界體系的

⁶⁷ 就出版的先後而言，是迷你體系在先，糊口經濟在後。但就理論的完整性而言，筆者懷疑迷你體系才是Wallerstein「定稿」的概念。但是不管如何，此處所介紹的社會體系三階段，與Polanyi所說，經濟現象的三種整合原則：相互性（reciprocity，如新幾內亞土著的「庫拉」物品交換）、再分配性（redistribution，如羅馬帝國的中央徵稅再把稅款用於帝國四方）、及交換性（exchange，如現代人在市場經濟中的交易）是相符合的。前述Wallerstein突出整合與交易的概念，顯然也與Polanyi的理論關係密切。見Karl Polanyi,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Karl Polanyi, et. al.,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Chicago: Henry Regnery, 1957), pp.149-155;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p.230.

⁶⁸ 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n Terence K. Hopkins, et. al., eds., *World-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2), pp.42-43.

⁶⁹ Ankie Hoogvelt,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60.

觀點，分析這些社群之間的關係。⁷⁰從以上勾勒的世界體系分析取向，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它在鉅觀的經濟分析上提供了新的概念辭彙-「世界體系」、不等價交易、半邊陲等等，而在文化分析上則有待補強。

從 Wallerstein 現代世界體系第一部出版之後，他就引來無數的辯駁，可以說環繞著世界體系學派另外聚結了批評世界體系的「茅屋工業」。我們以下著重在社會學者和人類學者的批評上。以分析社會革命聞名的 Theda Skocpol 率先出重拳，批評世界體系理論「首先是將社會經濟結構化約成受到世界市場的機會與科技生產的可能性所決定，第二是將國家結構與政策化約成受到『統治階級』的利益所決定。」⁷¹Skocpol 的第一個「化約」，是指 Wallerstein 對核心、半邊陲、與邊陲的劃分，其實都是根據著正統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強調的變項，反而不重視馬克思分析生產關係與剩餘價值的觀點。左派歷史學者 Robert Brenner 也附和這個批評，而稱 Wallerstein 一類的左派學者為「歷史化的[亞當]史密斯信徒」。⁷²Skocpol 的第二個「化約」與她的成名作有關，因為在她比較法國、俄國、與中國社會革命的前因後果中，她發現國家機器的成員自有他們獨特的集團利益，而與當時得勢的主要階級（ruling classes）的利益並不一致。⁷³

站在Wallerstein的立場，Christopher Chase-Dunn 試圖澄清世界體系理論並沒有觸及兩個「化約」。⁷⁴誠如我們上述摘要所示，近代全球性社會體系包含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子系統。Wallerstein 只是強調經濟、政治子系統的發展之間是「互賴與整合的」，他沒有必要把社會經濟結構（母系統）化約成單一的經濟過程。Chase-Dunn 接著訴諸歐洲歷史來反擊 Skocpol 的第二個化約指控。他指出歐洲「國家」先於資本主義而發生，

⁷⁰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Verso, 1991).

⁷¹ Theda Skocpol, 論Wallerstein 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理論與歷史的批判(Wallerstein's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 Theoretical Critique)。收於蕭新煌編，*低度發展與發展：發展社會學選讀*（台北：巨流，民國74年），頁408。

⁷² Robert Brenner, "The Social Ba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ohn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6-40.

⁷³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⁷⁴ Christopher Chase-Dunn, 「國際體系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一個邏輯抑是兩個邏輯？」收於蕭新煌編，*前揭書*，頁379-390。

並不證明「國家系統[或結構]」自主於世界體系之外。Skocpol 的國家自主說是因為她把先產生的「民族國家」直接當成是「國家系統」的緣故。但是 Chase-Dunn 卻避開回答 Skocpol「國家利益不必然等於統治階級利益」的理由。如果批評者承認 Chase-Dunn 的辯護有一定的道理，他們還是可以追問「那半邊陲的概念呢？如何定義？」⁷⁵即使是擁護 Wallerstein 的理論並承認半邊陲對維持體系非常重要的人，也會認為半邊陲的定義並不清楚。Peter Evans 並且引用支持 Wallerstein「世界體系的位置決定一國發展」論斷的研究，卻發現這個研究運作化 Wallerstein 劃歸為半邊陲的二十九個國家，卻重新把其中八國劃為核心，另九國劃歸邊陲。要運用世界體系的理論，似乎需要發揮很大的想像力。

來自人類學者的聲音，我們首先注意到他們對 Wallerstein 鉅觀的世界體系理論還頗為接受。他們主要的批評，倒不是集中在對半邊陲概念的不滿，而是不滿意 Wallerstein 對邊陲的了解太淺薄。Wolf 認為，Wallerstein 真正關心的是核心國如何逼迫邊陲國就範，對於人類學者最常調查的邊陲人民的反應問題就不甚了了。⁷⁶同樣的，Roseberry 把人類學者對世界體系的主要批評之一，從「生產模式」的角度出發而概括為「本土歷史與世界歷史構連的問題。」⁷⁷換句話說，兩位學者都不反對視全球為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概念化，但是如何把這一大背景帶入人類學者的邊陲，或稱本土研究範圍，卻是他們認為 Wallerstein 不足的地方。有趣的是，Wolf 和 Roseberry 都選擇了用改良過的「生產模式」概念在理論上試圖解決這個構連的問題。但是在介紹他們如何與結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接軌之前，我們先看看其他心向 Wallerstein 的學者，如何在研究、或田野調查上試圖解決相同的問題。

人類學者 George Marcus 反省在現代世界體系下如何進行民族誌的書寫時，檢討了「把鉅視觀點帶回解釋微觀情況與過程」的三種方法。首先是經濟學者最常用卻是人類學者最不满意的加總法：把每一個微觀情況機

⁷⁵ Peter Evans, 「超越核心和邊陲：評世界體系理論」。收於蕭新煌編，前揭書，頁 426-431。

⁷⁶ Wolf, *op. cit.*, p. 23.

⁷⁷ William Roseberry, *Anthropologies and Histories: Essays in Culture,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52.

械式的總合起來，自認為就得到鉅觀的圖像。其次是人類學者如 Benedict Anderson 使用的方法：把鉅觀體系描繪成在學者仔細研究過的微觀情況中，行動者在生活過程裡巧妙幻想出來或登錄下來的遺跡。最後是 Marcus 支持的方法：把鉅觀體系描繪成各種微觀情況散逸出來之意外結果的整體 (the totality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他並把他的方法落實到田野調查的設計上：學者先有世界體系的定見，再以敘事 (narrative) 說明這個體系如何表現在本土民眾知覺或不知覺的生活樣式中，並從俗民表現中導出對體系新的認識。⁷⁸而新一代的世界體系學者蘇耀昌在他博士論文的研究設計上，等於是把 Marcus 所言「形式化」。⁷⁹在說明世界體系的動力與本土勢力如何「連結」(linkages) 時，蘇認為應循著本土「被收編前的社會形構」、「收編的歷史過程」、「商業化過程」、「工業化過程」、「無產化過程」、及「發展的循環[擴張與收縮]過程」的六大步驟進行。親世界體系學者在研究方法上提議解決世界與本土構連的問題，我們在後文還有實例可供分析。現在我們先回到 Wolf 與 Roseberry 如何以生產模式的理論回應構連的挑戰。

Wolf 與 Roseberry 同樣關心資本主義如何侵入邊陲社會的問題；兩人同樣有保留的借助結構馬克思主義者的生產模式理論，試圖回答上述的「構連」問題。但是兩人向法國學者取經的結果，卻使得 Roseberry 在 Wolf 不疑處-分析邊陲社會資本化過渡期的概念-生出疑點來。讓我們從 Wolf 說起。

Wolf 批評結構馬克思主義者放棄了馬克思的辯證法，因此也就放棄了在體系內部找自生的矛盾關係的企圖。同時，結構主義者以體系至高的說法完全泯滅了個體意識的作用。此外，又把「生產模式」視為能夠擺脫時間控制的「精粹」。⁸⁰儘管如此，看在生產模式的構思能在機械式的因果想法之外別樹一幟，Wolf 還是採用這個觀念來組織他歐洲與無歷史族群的大

⁷⁸ George E. Marcus,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Ethnography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171-173.

⁷⁹ Alvin Y. So (蘇耀昌), *The South China Silk District: Local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World-System Theor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6), pp.7-9.

⁸⁰ Wolf, *op. cit.*, p.401.

書。他定義生產模式為「在歷史中產生的一組特殊社會關係。在這些關係裡，勞力被加諸於工具、技術、組織、與知識之中以便向大自然攫取能源。」⁸¹用這一定義，Wolf 區分歷史上的生產模式為三種：親族式的（kin-ordered）、納貢式的、及資本式的；區分的主要標準則在社會勞力是由族長、貴族、或是資本家所把持，次要標準則是以血緣團體或國家機器作為維持階級結構的支柱。

在 Wolf 的崇拜者眼中，Wolf 成功的把生產模式轉變為分析階級與權力關係的利器，也就是用生產模式「找出權力與財富累積的各種過程，而正是這種過程催生了各種社會不公平與意理強辯的模式。」⁸²但是，在 Roseberry 追究到底結構馬克思主義者的「生產模式」，帶給了人類學者什麼樣的啟發時，他等於是指出了 Wolf 分析工具不足之處。

Roseberry 重視結構馬克思主義者 Pierre-Philippe Rey 所提，非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構連的三階段說法。⁸³Rey 認為，除了當今美國所達到的完全不需要非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第三階段外，構連的第一個階段是以資本的流通（circulation）聯結兩種生產模式：非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以其固有的生產力及生產關係產出貨品，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交易，所以兩種生產模式並存是毫無問題的。而當資本主義社會基於本身資本累積及再生產的需要，無法以第一種構連來滿足時，它勢必以武力加諸流通之上以攫取資源；換言之，構連的第二階段主要是一個政治（武力加流通）過程。

Roseberry 關心的正是 Rey 的第二階段，又稱為資本主義根著期，或就是封建主義過渡期。⁸⁴Roseberry 引 Marx 的話說：武力征服的結果不外有三。勝利者把失敗者臣服於自己的生產模式之下；或前者只要後者納貢而不改變後者的生產模式；或彼此的互動產生一種新的綜合（synthesis）。歷史上充斥著臣服與納貢的例子，而像 Wolf 的三種生產模式也提供足夠的

⁸¹ *Ibid.*, p.75.

⁸² Jane Schneider, "Introduction: The Analytic Strategies of Eric R. Wolf," in Jane Schneider and Rayna Rapp, eds., *Articulating Hidden Histories: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Eric R. Wolf*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8.

⁸³ Roseberry, *op. cit.*, p.163.

⁸⁴ *Ibid.*, pp.166-167.

概念工具以分析這些例子。Roseberry 遺憾的是，資本主義自十六世紀擴張以來，在與「第三世界」社會碰觸的過程中，必然已出現極多 Marx 所說「綜合」的案例，而學者獨欠缺適當的理論去概念化這些「綜合」的情況。換言之，結構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獻帶給 Roseberry 最大的啓示，就是人類學者在面臨邊陲社會的資本主義根著期時，不論是 Wallerstein 的不等價交易或是 Wolf 的三種生產模式，在理論上都不足以掌握各種「綜合」，或可稱為新舊社會關係交集的情況。

至此，我檢討了八〇年代一些美國人類學者對邊陲社會構連問題，在研究與理論兩方面的反省：Roseberry 認為當時的構連理論是不夠的；而 Marcus 則認為可以本土社會互動結果的整體，勾勒影響本土互動的世界體系。如果這裡所說理論落後於研究的情況屬實的話，筆者倒認為突破困境的一法，是要求對理論有高度自覺的研究者，先做「型錄」(cataloging)的工作，也就是提供邊陲社會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各種民族誌，再在堅實的基礎上展開「綜合」的理論工作。而這卑之不甚高遠的解決方案，其實是 Wolf 或 Roseberry 自六〇年代末研究中美洲邊陲社會的小農行為時，就在做的事。Wolf 的研究，抑且影響到美國政治學者對冷戰時東南亞小農的調查。在本節的最後，讓我們評介這一部分深受左派影響的階級分析文獻。

Wolf 早期對小農的興趣，集中於在了解「北大西洋資本主義」做全球擴張的同時，第三世界社會的農民有何反應。不知是幸或不幸，他研究這個問題選擇的切入點卻是：傳統社會中的小農慣常以叛亂 (rebellion) 反抗外來壓迫，但是是什麼因素使得他們在應付資本主義的壓迫時，卻出諸革命 (revolution) 的手段？選擇這一切入點是幸運的，因為如下所示，Wolf 對革命中的小農做出了精彩的分析；選擇這一切入點也是不幸的，因為它直接跳過 Marx 所云兩種生產模式相遇時，可能出現的「綜合」情況。流風所及，政治學者 James Scott 雖然已看出小農遭受壓迫不一定轉向革命，但他了解小農傳統的「道德經濟」觀，仍忽略了「綜合」的可能性。⁸⁵直到八〇年代中期，他才重新詢問小農如何以其「弱者的武器」，在

⁸⁵ James C. Scott, "Hegemony and the Peasantry," *Politics and Society* (US), No. 7 (1977), pp.267-296;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Peasants and Commissars," *Theory and Society* (Netherlands), No.7 (1979), pp.97-134.

不發生革命的情況下與資本主義共存?即「綜合」才成爲他關切的對象。⁸⁶我們先看 Wolf 對小農革命反應的分析。

Wolf 認爲資本主義侵入本土社會，會先後帶來三大危機。⁸⁷首先是生態危機，指的是資本家對本土社會自然資源的榨取。其次是人口危機：醫藥科技帶來本土人口暴增，也帶來自然環境的超高負荷。最後是權威危機：新舊上層精英的快速替代造成社會秩序的瓦解，並產生與小農協同革命的中層精英。所謂中層精英是指市場仲介、基層官員、教師、及出身舊社會的貴族、地主、士紳及他們的後代；這些人同樣受到改變中社會的經濟壓迫而結合中等農戶及開發新地的墾戶（所謂「自由農」），成爲革命的主力。⁸⁸

在農民階級中爲何是文化上最保守的中農和自由農成爲革命軍的泉源？因爲他們原來是最依靠傳統社會的親屬關係及鄰里互助來維持生計的，而現在全面的市場化卻成爲他們生計的最大威脅，「正是中農及自由農力求保持他們傳統生活的企圖，反而使他們最具[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潛力。」⁸⁹另一個原因也出在他們保守的文化態度上。Wolf 指出，中農、自由農的傳統文化包括了「山高皇帝遠」的無政府主義及視重大社會變革爲「變天」的末劫（apocalyptic）思想，當資本主義及代理它的國家機器壓迫農民時，傳統文化就轉成了革命的助力。在三大危機及農民的保守文化相繼作用之後，中層精英與中農、自由農再經革命戰火本身的鎔鑄，終於成爲足膺變天重任的幹部與士卒，社會革命於焉誕生。⁹⁰

在資本主義經社結構勒緊小農頸椎，幾乎置之死地的同時，Wolf 強調他們的傳統世界觀有增強他們反抗決心的作用。這個浪漫的斷語並沒有遮掩住 Wolf 的眼光。他觀察墨西哥、俄國、中國、越南、阿爾及利亞、古巴六國社會革命之後小農的遭遇，在他浪漫的斷語中加入了「悲劇」的成

⁸⁶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⁸⁷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pp.280-282.

⁸⁸ Wolf, "Peasant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in Norman Miller and Roderick Aya eds., *National Liberation: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p.62.

⁸⁹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292.

⁹⁰ Wolf, "Peasant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pp.63-64.

分：「小農根本上扮演了悲劇的角色：他釋放現在悲情的努力只換得一個更巨大、更難捉摸的將來。但是，如果這是悲劇，它也同樣充滿希望。」⁹¹這是一個人本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心聲，而在 1960、1970 年代冷戰的氛圍中，歐美學府不乏有人豎耳傾聽。政治學者 Scott 是其中之一。

Scott 起初提出「道德經濟」說來理解東南亞小農在殖民主義入侵下的遭遇。此說的前提有三：氣候無常對環境的限制，家戶一年最低所需口糧，及有限土地的糧產。從三大前提中，他導出道德經濟理論的兩大元素。首先，互惠規範要求村民回報曾經幫助過他的人。⁹²所以一個地主應該在饑荒時寬待佃農因為他們會幫他累積財富，而佃農應該服從地主，因為他供給他們謀生之具。這一規範設定交換可比較（comparable）價值的理想情況。第二是具體的生存權，指的是「村民對其經常使用的資源保有使用權利。只有村民基本溫飽得到滿足之後，他人才能染指本村資源。」⁹³所以村民對國家索稅及地主索租是以生存權來衡量，而決定他們被剝削的程度。

從「道德經濟」說 Scott 進而預測村民必須發展出「保險制度」以落實兩大道德規則。譬如說，依互助及保障最低口糧的精神，地主必須按照佃農的年生產情形收不定額租（豐年多收，荒年少收）。但是，殖民主義的入侵造成租稅的提高或固定，根本破壞了村民的保險制度也侵犯了他們的道德經濟感。嚴重的剝削使村民憤怒，但是，不同於 Wolf，Scott 強調憤怒的村民絕少走上叛亂或革命之路，反而他們會在日常生活中以偽裝的反抗-Scott 下一部著作的主題-宣洩不滿。

幾乎所有的專家都否定「道德經濟」說可一體適用東南亞各國的情況，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也認為加以增減，提高「道德經濟」對脈絡的敏

⁹¹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301.

⁹² 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67.

⁹³ Scott, "Hegemony and the Peasantry," p.279.

感度 (context-sensitive)，它未必不是有用的分析工具。⁹⁴但是在經驗研究之外，對「道德經濟」說最深刻的理論批判來自 Samuel Popkin 的「政治經濟」說--根本否認以共享的道德價值解釋小農行為的有用性。Popkin 認為注重最低糊口的生存權沒有意義，因為一個理性的小農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想辦法發財。⁹⁵當 Scott 說地主會在荒年幫助佃農因為前者需要服從互助規範，Popkin 卻認為地主只會選擇性的幫助一些佃農，使佃農分成兩派而他可以分而治之。

Popkin 進一步指出互助規範作為概念的缺失。Scott 說地位不等的兩人可根據這一規範而交換可比較的價值，如以糧食換取日常的恭順。Popkin 認為交換可比較的價值只會發生在地位約略相等的人之間，像地主佃農兩個不同階層之間進行等價交換，事屬罕見。⁹⁶

Popkin 的批評其實也有兩個弱點。一方面，用經濟人的概念代替小農，他根本解除了小農的概念。所以小農對土地的眷顧、他們保守的世界觀、對新技術引入的遲疑等等都無特殊之處，都可以從經濟人面臨市場的決策過程中推論出來。這種把市場經濟發達後人類演化出來的工具理性，讀入糊口經濟的運作邏輯之中，有可能犯了時代倒錯的謬誤。另一方面，既然沒有互惠規範作為上下階層的道德粘膠，我們很難想像傳統農業社會中一旦有叛亂，地主可以帶領佃農出生入死的情況。領導權的合法性似乎很難在道德真空中獲得。

既然 Scott 不認為村民時常以叛亂或革命來反抗壓迫，他在 1985 年的著作中就進一步要討論他們在日常偽裝下的抗拒行為。在新著中他用生產模式的生產力（下層結構）及生產關係（上層結構）模式，來組織他在馬來西亞的村莊--Sedaka（化名）--田野調查的資料，但是強調上下二層結構

⁹⁴ Paul R. Greenough, "Indulgence and Abundance as Asian Peasant Values: A Bengali Case in Poi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42, 1983, pp.831-850; Charles F. Keys, "Introduction: Peasant Strategies in Asian Societies: Moral and Rational Economic Approaches-A Symposiu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42, 1983, pp. 753-768; James M. Polachek,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Kiangsi Sovie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42, 1983, pp.805-829.

⁹⁵ 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4.

⁹⁶ *Ibid.*, p.47.

都必須透過當事人的意識與理解才能運作。⁹⁷資本主義與 Sedaka 的構連，是透過馬國政府為增產而在當地投資的兩項建設：耕種的機械化與擴大灌溉區使得該地稻米可以一年兩熟。這種生產力的改善帶來貧富農戶關係的轉變：從租佃權、租金、打工給付、禮物饋贈等行為都可看出。而階級關係的矛盾都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文化產品」中，亦即人前人後的私語、謠言、笑話、成語、及民謠等等。⁹⁸

Scott 從上述文化產品中讀出了 Sedaka 村民在生產模式未改變前的兩大道德理念：所有村民在神明面前都是平等的；富人有意義幫助窮人。⁹⁹隨著國家建設的介入，村民的所得差距逐步擴大，但是村民的道德理念卻如前述 Abner Cohen 所說的，表現「文化遲滯」的現象。所以不管富農貧農，只能以他們現有的、舊的文化資源來論述所得兩極化的現象。儘管貧農的絕對所得在增產之後有長足的改善，他們擅長誇張自己的貧窮程度而歸咎於田租上漲或耕地減少；最終他們歸咎於富人不仁因為是他們擅改了租佃的規定。

另一方面，富農既然還沒有資本主義的經濟人語彙，他們同樣訴諸傳統文化來維護權益。他們強調窮鄰居物質生活的實質改善，並掩飾自己新得的財富以證明他們還是遵守神前平等的古訓。所以新生產模式中的貧富階級，各取傳統道德中有利於正當化己身的部分以保護自己的利益。

Scott 在新著中表現受 Popkin 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因為與資本主義構連發生改變，而意識型態卻未變的 Sedaka，不同的階級卻相同的訴諸傳統道德來維護一己的利益。利益至上的經濟人圖像令人過目難忘。但是更重要的，Scott 的民族誌駁斥了 Wolf 視叛亂為小農反抗壓迫常態的謬誤，也鮮明的刻劃出在新舊生產模式交匯時，「綜合」出的階級口舌鬥爭的樣相。但是 Scott 不認為 Sedaka 的綜合情況可能持久，資本家終將當道，因此他對當地小農的境遇充滿了「悲觀」。¹⁰⁰最後，Scott 不期然實現了 Marcus 所言：把鉅視觀點帶回解釋微觀情況與過程最好的

⁹⁷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pp.43-45.

⁹⁸ *Ibid.*, p.305.

⁹⁹ *Ibid.*, p.220.

¹⁰⁰ *Ibid.*, p.350.

方法，就是把鉅觀體系描繪成各種微觀情況散逸出來之意外結果的整體。這從 Scott 在他的民族誌資料中，讀出資本主義體系在 Sedaka 的實地運作（透過二熟制、定額租、引入割稻機、及開墾荒地）就可獲知。巧的是，Marcus 也提到，運用他所推薦方法最佳的架構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體系圖像」，也就是生產模式模型。¹⁰¹

從包籠全球的世界交易體系，經過選擇性的採用生產模式概念，再到新舊生產模式交錯下的小農研究，本節除了評介自 1970 年代中期興起的馬克思主義政治人類學取向之外，另一主旨則在闡明這一取向對前文所述，深受英國結構功能主義影響的體系及過程取向「挑戰」的真諦。也許我們可以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正反合階段論，來看待直到 1990 年代之前，政治人類學在半個世紀中，三個取向的演化過程。

早期的體系論者多不自覺，或不願意承認他們在異民族的研究工作之所以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已經是英國資本主義擴張下的既得利益者。¹⁰²在 Asad 看來，這種結構位置正是體系論者意識形態偏見的來源。所以在英、法、德瓜分完非洲之後，他們可以置殖民母國對土著的政經影響於不顧，而把土著社會描繪成一個自足的、勢力均衡的、純依內在的分支原則演變的「體系」。在 Gluckman 帶入衝突觀點的過程分析之後，我們看到曼徹斯特學派的學者，在個體政治行為的分析上，創造了豐富的理論語彙-社會劇、象徵、雙聲帶等。尤其是 Turner 的「領域-情境」及 Cohen 象徵的客觀化、正當化、及神秘化三過程，不但是預設了某種結構整體的存在使得個體的互動過程可被理解，這些概念也試圖去整合微觀的行為分析和鉅觀的體系分析。但是過程取向學者的努力，以歷史的後見之明看來，要到 Scott 分析 Sedaka「弱者的武器」才算得出令人滿意的結果。這是因為前有 Wallerstein 及結構馬克思主義者的交鋒，把自足的本土「體系」擴張到涵蓋全球，或者被「生產模式」所取代；後有 Marcus 在民族誌研究上的澄清，肯定本土生產模式的架構最足以同時解決鉅觀與微觀的連接問題。

¹⁰¹ Marcus,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Ethnography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p.173.

¹⁰² Talal Asad, "Two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Rule," in Talal Asad, ed.,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1973), pp.105-111.

於焉我們才能夠欣賞 Scott 民族誌的長處。¹⁰³然則，進入 1990 年代的政治人類學呢？如果說 Scott 的民族誌立下了新馬政治人類學研究的範本，這並不是說它是這個領域內唯一的模範。1980、1990 年代其他人類學者還貢獻了許多政治人類學的議題與研究，限於篇幅，在下面的最後一節當中，我們只能討論邦國形成的議題。¹⁰⁴

四、邦國形成—政治人類學 與比較政治學的可能對話

討論邦國形成(state formation)的研究議題，1978 年可以做一個巧合的

¹⁰³ 如果我們以「得魚忘筌」的態度來理解馬克思所言，兩種生產模式交錯時可能會產生「綜合」的情況，那麼本地政治人類學者黃應貴新著的論文，也可以說很成功的刻劃了南投東埔社布農人在日據、國府的「殖民秩序」中，發展出對政治的「綜合」理解。黃氏認為，seizin（日語「政治」，發音seizi的訛轉）是布農人以其傳統的文化觀點（含人觀、hanido「精神」觀、及二者引出的三種權力關係）理解殖民秩序後，逐漸形成的「新的社會活動範疇」。在這一「綜合」的範疇中，布農人一方面以舊的權力觀來看待國府的科層體制（所以視鄰長到總統的各層行政首長都是不分等的「頭目」），另一方面也與時俱進把三種權力關係中的ishno交換原則（以個人能力與魅力換得別人效法的關係）現代化為一種「超越地方性與制定性」的權力。「文化」內部的維持與轉變，都在本文中透過對布農人長期的研究而以堅實的例證呈現出來。見黃應貴，「政治」與文化：東埔社布農人的例子，*台灣政治學刊*，第3期（民國87年），頁115-193。

¹⁰⁴ 限於篇幅的嚴格限制，我們不得不捨棄評介人類學研究民族主義的文獻。但是，自1983同一年兩位人類學者Benedict Anderson與Ernest Gellner出版了民族主義的著作以來，配合了蘇聯、南斯拉夫聯邦解組，中亞、巴爾幹民族主義的風起雲湧，人類學者實際上帶動了八〇年代以來的民族主義研究熱潮。Anderson（1998）收集了他87年以來所寫有關民族主義的論文；Gellner在95年底去世之後，Hall（1998）所編紀念論文集，極力拉近Gellner的民族主義功能論與現實的關連。以上二書代表了最近的現代性觀點民族主義理論。從後現代觀點批評Anderson與Gellner的可參看Duara（1995），而Eley and Suny的讀本（1996），則是筆者所知代表對民族主義的研究，正從現代觀點向後現代過渡非常有趣的選集。有關Anderson與Gellner理論的中文評介，可見方孝謙（1994）、江宜樺（1998）。見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1983]);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World*. (London: Verso, 1998);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Geoff Eley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John A. Hall 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方孝謙，「殖民地民族主義與1920年代的日治台灣」，*東吳社會學報*，第3期，（民國83年3月），頁161-197；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公司，民國87年）。

出發點。一方面是在政治人類學的傳統中，繼**非洲政治體系**一書提出邦國與無邦國型社會的基本分類之後(詳第一節)，人類學者發展出第二波有關早期邦國源出階層或正當化需要的辯論。¹⁰⁵另一方面在同一年，比較政治學者 O'Donnell 針對第三世界的政經發展，提出他解釋南美情況的成熟模型-科層威權政體(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簡稱 BA 政權)，也在次年引起廣泛討論。¹⁰⁶邦國起源說接著引發人類學者，乃至社會學者，在八〇年代對邦國形成之意義層面(semiotics)的興趣，我們以討論 Clifford Geertz 及 Philip Corrigan and Derek Sayer 的著作做代表；¹⁰⁷並論及1990年代人類學者對「邦國的經濟人類學」與「市民社會」的探討。而巧合的是，「市民社會」也正是1990年代的比較政治學者在提出「社會中的國家」(state-in-society)的理論架構之餘，集中研究的題目。至於「社會中的國家」架構，則是在 BA 政權模型之後，學者對1980年代所提「恢復國家定位」主張的反動。¹⁰⁸以下我們就依政治人類學與比較政治學的兩個脈絡，分別討論邦國形成的議題。我們會認識到，第三世界相對於市民社會之理念、道德及制度、過程的比較研究，可能成爲在全球化、網路化衝擊下，政治人類學者與比較政治學者對話的焦點。

政治人類學者在1978年出版了兩本有關邦國源起的論文集。文中把 Morton Fried 階層造成邦國，與 Elman Service 合法官員創造國家的立場，解析得非常清楚。論者認爲 Fried 主張，邦國是爲維護一定的社會不平等而產生的組織，也就是說不同階層(因此有不同攫取稀少資源的機會)的存在，是邦國形成的必要條件；這是一種階級衝突型的理論。¹⁰⁹而 Service 則

¹⁰⁵ Ronald Cohen, "Introduction," in Ronald Cohen and Elman R. Services, eds., *Origins of the State: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al Evolution*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78), pp. 1-20;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The Early State: Theories and Hypotheses," in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eds., *The Early State*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78), pp. 3-29.

¹⁰⁶ David Collier, "Overview of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Model," in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¹⁰⁷ Clifford Geertz,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hilip Corrigan and Derek Sayer, *The Great Arch: English State Formation as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¹⁰⁸ Peter B. Evans, et. a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¹⁰⁹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The Early State," p. 16; Ronald Cohen, "Introduction," p.7.

主張領導官員在取得人民的認可-獲得正當性-之後創建國家，換句話說國家是人民認為有效率的中央政權對他們的生活有利，而授權部分團體形成的「社會契約」；這是一種整合型的理論。¹¹⁰雖然兩本論文集，分別有不同的作者對以上任一理論提出支持或反對的證據，尤其是考古學上的證據，一般的反應還是認為，國家源起應該是有多種原因的。至少兩書中共同提出的階層與正當化以外的因素就有：人口壓力、戰爭、征服、生產與貿易等。¹¹¹過了三年，當 Henri Claessen 與 Peter Skalnik 再編有關邦國的論文集時，雖然人類學者還有討論國家形成的多因論的，但熱情似乎已消，有關國家的討論重點已然轉移。¹¹²

不過，Cohen 在他編輯的論集中，已經查覺到有一個議題被人類學者忽略了：邦國形成時君王的神聖化（sacralization）問題。¹¹³而正是這一議題在 1980 年代中得到 Geertz 及 Corrigan and Sayer 的討論。前曾提到，Geertz 不會系統化他撰寫民族誌的手法，反而他是以精緻的小品文出之。在我們分析他討論邦國意義的歷史民族誌-Negara（峇里語，意謂國都）之前，讓我們先從他的小品中探討他對「厚描」（thick description）做為民族誌撰寫方法的反省。

Geertz 自云，他的「厚描」概念等同於哲學家 Paul Ricoeur 的「銘刻」（inscription），意謂「意義的固定」。¹¹⁴其有四大特點：它是一個詮釋的動作：詮釋的對象是「社會的論述流程」；目的是拯救論述中的含意（the “said”）免於湮滅；為達到目的，詮釋的動作必須在微觀的層次上進行。¹¹⁵其次他提到，具體的論述之一為象徵，指的是可以承載概念或意義的任

¹¹⁰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Ibid.*, p. 17 ; Ronald Cohen, *Ibid.*, p.7.

¹¹¹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Limits: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Early State," in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eds., *The Early State*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78), p.625 ; Ronald Cohen, "Introduction," p.8.

¹¹²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Ubi sumus? The Study of the State: Conference in Retrospect," in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eds., *The Study of the State*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81), p.484.

¹¹³ Ronald Cohen, "Introduction," p.16.

¹¹⁴ 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31.

¹¹⁵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20-21.

何載具，而這一載具兼有做為現實的模型與模範的可換特質。¹¹⁶也就是說，象徵的含意一方面傳達相對於社會現狀的理想，另一方面象徵也可轉換成以其理想、意義改變、或提升社會人心；這特別指的是宗教方面的象徵而言。最後以宗教象徵的意義而言，它涵蓋三個層面：在說理上，意義必須能夠澄清「人智有時而窮」的困惑；在情緒上，它能安撫生而受苦的普遍感覺；在道德上，它能釋懷邪惡與良善並存的窘境。¹¹⁷如果說上述乃 Geertz 的厚描方法論，那麼他 Negara 的民族誌在多大程度上力行了這個方法？

Geertz 曾摘要 *Negara* 的主旨如下：¹¹⁸

我的分析一方面.....是要展現下一事實：[十九世紀的峇里島]從親屬組織、貿易、習慣法、供水一直到神話、建築、塑像、火葬，每一件事如何湊合成為一個特殊政治理論的宣言，也就是對地位、權力、威權、與政府的實然與應然的特殊看法：即在世間重現諸神的世界，因為那也正是人之世界的模範。國家機構演出神界秩序的影像-影像是觀戲者的模範，也是神界秩序的模型-而這一影像因之規範了社會的秩序。另一方面.....觀戲群眾不只是欣賞國家表演時目瞪口呆的觀眾而已，他們也是國家政治大戲中親自演出的一員，這尤其是以全國性的慶典為然。這種慶典以戲劇般的力量塑造大眾的心，使他們投降，使他們改變；正是這種經驗的強大力量保持了政權的完固。重複的政治戲碼加上觀眾的粉墨登場相當程度.....化[上述政治]理論為真。（底線筆者所加）

筆者無法摘錄峇里 Tabanan 國稻田祭這樣的國家慶典，如何在中央稅吏（sedahan）啓闢讓灌溉用水流出開始，隨著用水流經境內的每一畦梯田，阡陌上的農民觀眾隨之行禮如儀-宗教與經濟制度動態結合，形成社會秩序-的美妙景象，Geertz 的民族誌筆觸已接近詩。¹¹⁹但是我們覺得 Geertz 在 *Negara* 中的厚描已經置「微觀層次的詮釋」於不顧；相反的，在

¹¹⁶ Ibid., pp.91-94.

¹¹⁷ Ibid., pp.100-107.

¹¹⁸ Geertz, *Local Knowledge*, pp.29-30.

¹¹⁹ Clifford Geertz,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 (Princeton,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77-82.

這一部歷史的民族誌中，他要「建構」峇里社會發展的連續時期，每一時期有它的成立條件和結果。而建構的方法則是找出與歷史上的峇里社會有「家族近似性」的現代社會，分析後者的「結構與功能」以「彰顯」前者。¹²⁰從事微觀詮釋所需的史料不全，可能是 Geertz 不得不爾的主因。但是正因為史料不全，我們也無從判斷他所分析峇里島宗教象徵在說理上、情緒上、及道德上的意義，到底是較好的還是較差的詮釋。

除此之外，Geertz 是貫徹了他所謂象徵是理想的模型（a model of）也是現實的模範（a model for）的主張，這從上面的引言中，尤其是加深線的部分，就可以了解。更重要的，他以 Negara 著重國家在官民地位（status）、節慶壯觀（pomp）上的表現，直接而有效的挑戰西方政治理論一貫強調的國家的統治（governance）功能；他並指出地位、壯觀、統治三者本來都是西方「國家」（state）一詞在語源上交錯的三大主題。¹²¹

國家在社會秩序的意義層面上扮演的角色，也是歷史社會學者 Corrigan and Sayer 討論自十一世紀諾曼征服以來，英國近千年之邦國形成的焦點。這本書對非英國人而言，恐怕有不耐卒讀的感覺，因為作者似乎預設他們的讀者都熟諳英國史，所以呈現史實細節時常有「不及」但有時也有「過多」的地方。不過他們提出「視邦國形成為文化革命的觀點」，¹²²卻有與 Geertz 暗合之處。為什麼英國的邦國形成必須視為文化革命？因為在這長達近千年的時間中，富者的「財產權」與貧者服膺市場的「紀律」逐漸在法規與儀式的完備下，得到確立；而產權與紀律的確立過程，則又受到法規本身的常態化與儀式化的組建。¹²³換言之，邦國形成包含三大過程，而最重要的是「正當化手段（司法體制、代議政治的形式、及宗教）的改變過程」，¹²⁴也就是上述之法規的常態化與儀式化。

國家用以自我正當化的手段包括了各種活動和制度，這在作者們看來就是各種的「文化形式」。這些形式使得國家得以進行「道德管制」，也就

¹²⁰ *Ibid.*, pp.5-6.

¹²¹ Geertz, *Negara*, pp.121-123.

¹²² Corrigan and Sayer, *The Great Arch*, p.11.

¹²³ *Ibid.*, p. 3 & p.12.

¹²⁴ *Ibid.*, p.10.

是「把特定歷史中的社會秩序所內含的本體論及知識論前提，加以正常化、自然化，即變成『天經地義』的計畫。」¹²⁵但是如何進行這樣的道德管制？這就牽涉到國家如何集合被統治者成爲一個「民族國家」（nation），又如何把集體的民族化約爲個別的市民（citizen）的問題。

本書的理論取向容有模糊之處，但是它的重要性在它與 *Negara* 一樣，都在邦國形成的過程中，專注英國或峇里的國家編織社會的意義之網的層面。而像「道德管制」概念的提出，則更進一步幾乎與 1970 年代以來學者盛論的 Antonio Gramsci「霸權」理論合流，¹²⁶雖然兩位作者在全書中無一處提到霸權。Gramsci 的「霸權」，指的是國家以文化策略滲透與之對立的「市民社會」，從中建立不但是政治上，而且是道德上的領導權之過程。¹²⁷但是 Gramsci 就如同 Corrigan and Sayer 一樣，都未講明在歐洲歷史上適用的所謂「市民社會」，是否適合在第三世界的脈絡中使用-這是 1990 年代不管是政治人類學者或是比較政治學者都遇到的問題，我們留待稍後處理。

1990 年代政治人類學者另一有關邦國形成的議題，是在討論所謂「邦國的經濟人類學」，我們權以 Elizabeth Brumfiel 爲她所編論文集寫的介紹做討論的標的。Brumfiel 認爲國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維持經濟組織」。¹²⁸而從後文的鋪演，我們知道所謂經濟組織，指的正是前述 Wolf 所定義的「生產模式」。但是，國家如何介入經濟而完成它維持生產模式的功能？這主要依國家的權力基礎何在以及它所處的制度環境爲何而定，Brumfiel 用比較「納貢式」及「資本式」生產模式下的國家作爲來說明。

在納貢的生產模式下，國家因農業經濟中政治精英彼此的競爭壓力而誕生，即競爭產生對剩餘財富的需求，國家因而被催生以攫取財富。所以

¹²⁵ *Ibid.*, p.4.

¹²⁶ Eric R. Wolf, *Envisioning Power: Ideologies of Dominance and Crisi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45.

¹²⁷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p. 206-209.

¹²⁸ Elizabeth M. Brumfiel, "The Economic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An Introduction," in Elizabeth M. Brumfiel, ed., *The Economic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p.1.

國家的權力基礎來自對農產品的搜括，但是如何搜括及搜括到什麼程度則受到制度環境的制約。譬如，親屬團體的存在與否會影響到搜括的頻率；而市場制度的健全與否則攸關以糧或以錢課稅的決定。¹²⁹

在資本式的生產模式下，國家變成在公司行號間進行搜括，而官員的權力基礎也轉為由他們仲裁勞資糾紛的能力而定。至於影響官員介入仲裁的制度環境本質為何，至目前為止，還環繞在政府官員是否為資本家階級的侍從而爭議不休。¹³⁰

就論文集的整體來看，Brumfiel 認為可以得到三個結論：¹³¹國家介入經濟的方式千變萬化，但多數可用連結國家與經濟的制度結構來解釋；¹³²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不止於生產與分配兩方面，介入經濟的同時它也改變了社會關係而深刻的影響了社會的消費習慣；最後，邦國的經濟人類學主張對制定經濟政策的官員的研究，不但要著眼經濟體系內部與國家內部的需求，也要注意體制之外經常被視為無力階級的要求。

到目前為止的討論中，我指出了政治人類學者在過去一甲子對邦國形成的論述，歷經了基本分類、起源、象徵意義、邦國與經濟等的變化。要注意的是，這一部分的討論我是偏重在議題的推陳出新，至於舊議題帶來後續的爭辯與影響，限於篇幅與識見，一概從略。¹³³在另一方面，比較政治學者在 1970 年代以後討論國家形成的問題，就顯得櫛比鱗次-後一波的理論架構明顯的是針對前一波的不足而來。我們依序討論 BA 政權、「恢復國家定位」、「社會中的國家」等三種理論架構，並以「社會中的國家」學者所提第三世界的「市民社會」概念，與政治人類學者在九〇年代對相

¹²⁹ *Ibid.*, pp.2-3.

¹³⁰ *Ibid.*, p.4.

¹³¹ *Ibid.*, p.12.

¹³² 其實，比較政治學者與社會學者在研究解組後的東歐、中國的政經關係時，也異曲同工的用制度結構-特別是上述經濟學者Douglass North所發揚光大的產權理論-作為分析的焦點。最近這方面的著作，談東歐與中歐的可見David Stark. and Laszlo Bruszt, *Postsocialist Pathway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談中國的可見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¹³³ 對政治人類學的邦國形成議題有比較完整討論的著作，可參看John Gledhill, *Power and Its Disguis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London: Pluto Press, 1994)。

同概念反省的對照做結。

BA 政權的首倡者 Guillermo O'Donnell，以現代化與依賴理論為基礎，明確提出南美國家在二次戰後，因為在世界體系中對國際資本的依賴，逐漸形成一種反民主，並以軍人背景的技术官僚不斷干涉經濟的 BA 政權。之後，這種說法引發研究拉丁美洲與東亞區域學者的熱烈討論。O'Donnell 認為南美國家在二次戰後的發展經驗，需循政治與經濟兩條軸線來看。¹³⁴政治上，戰後民粹式的政治動員升高了各國內部的階級對立，也呼喚著一種強而有力政權的出現。經濟上，在進口替代、消費財加工的初級工業化之後，跨國企業進入南美各國，在具備外國資金的情況下如何使工業「深化」，再次召喚一種特殊的政權。政治加上經濟發展上的需要，催生了以軍人技術官僚為主的 BA 政權，它的存在起初就為了摧毀國內的民粹勢力，並引進更多的外國資本。所以初登舞台的 BA 政權，都具有政治上孤立（不與任何階級往來），經濟上依賴外資而恪遵自由經濟教條的外觀。O'Donnell 並認為 1968 年後的阿根廷就出現了 BA 政權，但旋即在與本國中產階級、國際資本家的三角互動中跨台，倒回民粹式政權；而巴西的 BA 反過來主導了三角結盟的形成。

O'Donnell 的主旨一出，可說是爭議遍地。在拉丁美洲的範圍內，學者主要抨擊巴西根本不符合，或只有以拉大所得差距以刺激經濟成長的說法部分符合 O'Donnell 描繪的情況。¹³⁵而在理論部分，不管 O'Donnell 是說工業深化乃 BA 出現的「必要條件」，或是說深化與 BA 乃彼此「選擇性吸引」（elective affinity），他都是虛構了經濟發展進程與特定政權形態之間的關係。¹³⁶在東亞對所謂「四小龍」的研究中，Evans 特別為 O'Donnell 的理

¹³⁴ Guillermo A.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 pp.7-11.

¹³⁵ Jose Serra, "Three Mistaken Theses Regar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117; Albert O. Hirschman, "The Turn to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Search for Its Economic Determinants," in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81.

¹³⁶ Robert R. Kaufman, "Industrial Change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Latin America: A Concrete Review of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Model," in David Collier ed., *Ibid.*, p.247; Serra, *Ibid.*, p.148.

論檢查了一本論文集的所有證據。¹³⁷他發現所謂外國資本充斥乃催生 BA 出現的要因，並不適用東亞；更進一步，說 BA 壓迫工會，而造成有技術與無技術工人之間所得差距的懸殊，也不正確。兩項斷言所以失真，是因為東亞國家所運作的階級空間，迥異拉丁美洲；而東亞國家在其階級空間中發展出來的外銷導向的工業化策略，又是不見諸拉丁美洲經驗的。

Evans 在這裡扮演的角色是很有趣的。早年以附和 Fernando Cardoso (後來成爲巴西總統) 之「依賴發展」理論而出名，¹³⁸他重視的是國家與社會階級互動的關係；而以東亞檢視 O'Donnell 的理論時，Evans 還是強調國家與階級環境互動的重要性。但是，Evans 同時也是「恢復國家定位」的主要倡導者。事實上，他與 Dietrich Rueschemeyer 合著的論文，就對「恢復國家定位」架構所要研究的課題，說明得非常清楚。他們先定義國家爲「在一定領土內有權爲人民及其他機構做重要決定，且必要時得以武力貫徹這些決定的機關。」¹³⁹在這個韋伯式 (Weberian) 的定義之下，他們認爲國家是四種矛盾利益的綜合體：支配階級的利益、國家自體利益、社會鬥爭的場域、及全民利益的保障者。¹⁴⁰自此他們引出有關「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 與「國家自主」(state autonomy) 的兩大命題來。所謂「國家能力」是指著國家爲了有效平衡以上四種利益，它必須成爲階序謹嚴的官僚機構。而所謂「國家自主」，則指爲了有效發展經濟，國家必須從支配階級中脫離-即能夠相對自主的存在；這個命題本身又可導出兩個小命題：首先，當國家是資本主義導向時，國家愈自主，愈能引導社會累積財富。其次，支配階級內部愈分裂，或被支配階級本身愈能施壓，則國

¹³⁷ Peter Evans, "Class, State, and Dependence in East Asia: Lessons for Latin Americanists," in Frederic 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19.

¹³⁸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trans. Marjory Mattingly Urquidí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¹³⁹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Peter Evans, "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oward an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Underlying Effective Intervention," in Peter Evans, et. al. eds., *op. cit.*, pp.46-47.

¹⁴⁰ *Ibid.*, pp.47-48.

家享有的自主性愈高。¹⁴¹另一位「恢復國家定位」的主倡者 Skocpol 也同樣主張在韋伯式的國家研究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家能力與國家自主的議題。¹⁴²

新一波主張「社會中的國家」架構的政治學者，並不否定韋伯式研究國家的途徑。相反的，他們承認尤其是二十世紀的國家，總是扮演了引導社會、經濟變遷重要而直接的角色；而國家本身權力的組成，也影響到社會、經濟活動者的誘因，間接又塑造了社經變遷的走向。¹⁴³即使是「恢復國家定位」學者所提「國家自主」的議題，他們也認為很重要，但是有需要進一步的解析：國家自主可被理解為政治因素本身是獨立而重要的，因為掌權者可以做深遠影響社經結果的決定-這是「恢復國家定位」學者的認知。¹⁴⁴但是，國家自主也可以意謂，政治文化與結構不會即時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起舞，也就是政治傳統具有持續性；而這種政治自主必須帶入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層面方可理解。換句話說，新一波的學者首先批評強調政治因素本身獨立的人，對國家的認知太過單一化，而完全看不清，國家形成與它在社會上與各方勢力爭取支配權的鬥爭脫不了關係。

即使是「國家能力」的議題，Joel Migdal 對「恢復國家定位」學者的主張也有批評。他認為上述學者「太過重視國家為人民做重要決定的能力」，實際上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情況所在多有。他呼籲比較政治學者向人類學取經以研究「政策執行」這個國家能力的問題；在他看來，人類學者以參與觀察的方法，對國家各層級與社會各方面做「權力與象徵互動」

¹⁴¹ *Ibid.*, pp.61-64.

¹⁴²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Evans, et. al., eds., *op. cit.*, pp.9-20.

¹⁴³ Joel S. Migdal, et. al., "Introduction," in Joel S. Migdal, et. al.,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

¹⁴⁴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On Political Conten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in Joel S. Migdal et al.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02.

的分析，才真正能反映國家涉入社會的情況。¹⁴⁵

批評之外，主張「社會中的國家」的學者也再三強調他們新架構的三大特徵。首先，需解構國家為更小的研究對象。¹⁴⁶這個解構的工作可用軍事作戰的比喻分為四層，即對壕溝戰士、野戰軍官、方面軍司令、及三軍統帥分別加以研究。¹⁴⁷其次，要對過去概念化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範疇，細加檢討，因為這些範疇似乎沒有捕捉到國家與社會「演變而流動」的界限；這些有問題的概念之一就是「市民社會」。最後，要注意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互相影響、互相改變的。這意謂一則不應視社會變遷只朝單方向走到一個可預知的目的地；再則學者有必要深入了解新研究課題，如市民結社的變動本質與程度，及第三世界國家中導致市民社會發生的過程等。

148

新架構的特徵中不斷提到市民社會。Migdal 對此一概念做了較深入的檢討。¹⁴⁹他認為過去許多人以前後不一致的態度用這個概念：一方面承認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視整個社會被所有利益牽向同一個方向移動。還有人就假設，橫跨社會千百種組織中的各種規範、產權關係、行為模式通通只是用來增強國家的統治，使其維持秩序而不必動用武力。但是，即使市民社會存在，各方勢力也不會水乳交融而呈現以幾個根本理念為主的「文化霸權」；視市民社會完全整合於統一霸權的人，忽略了「分散性支配」(dispersed domination) 存在的可能性，¹⁵⁰也就是國家或任何社會勢力都無法支配全國，而國家階序本身的各層則被拉向不同方向的情況。

Migdal 對市民社會以及其背後的霸權理論的批評，與另兩位「社會中的國家」之主倡者，Atul Kohli 和 Vivienne Shue 並不同調，後者還是有興

¹⁴⁵ Migdal在這裡引本文第二節所評介的曼徹斯特人類學為立論張本。見Joel S. Migdal, "The State in Society: An Approach to Struggles for Domination," in Joel S. Migdal et al. eds., *Ibi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1.nb22.

¹⁴⁶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p.294.

¹⁴⁷ Migdal, "The State in Society," p.16.

¹⁴⁸ Kohli and Shue, *Ibid.*, pp.294-295.

¹⁴⁹ Migdal, *op. cit.*, pp.27-30.

¹⁵⁰ *Ibid.*, p.9.

趣追究哪些過程可能導致第三世界國家中市民社會的誕生。而正是對第三世界之市民社會的關心，才使得新一波比較政治學的走向，閃露與 1990 年代政治人類學合轍對話的可能性。最後，讓我們轉到一位人類學者對市民社會的看法。

對編輯了 *Civil Society* 論文集的 Chris Hann 而言，過去學者對市民社會的辯論，都把它限定在現代西方自由的個人主義框架中使用，並把它與國家完全對立。而人類學者討論這個觀念的獨特貢獻是，帶入「非正式的人際實踐」的層面。¹⁵¹也就是說，人類學者把市民社會定義得較寬廣也較沒有與國家對抗的意味，而指的是「在社會生活中促進合作與信任的所有理念與實踐」。¹⁵²採用這麼寬鬆的定義目的何在？因為在這樣的定義下，人類學者開拓了一種「比較政治哲學」的課題，容許他們去探索各種文化中迥然不同的理念與道德，「只要這些是有助於人類社群中團結與互信的滋長。」如果說 Migdal 代表了市民社會的衝突觀點，那麼 Hann 就是代表了剛起步的人類學市民社會整合觀。這種整合觀與 Migdal 所批評的，視市民社會臣服於國家的霸權統治的整合觀不同，是在全球化、網路化的世界體系中，認識到各個文化有必要團結、合作、互信，而對相關的理念與德目做參與觀察式的比較研究。背後隱藏善意的、積極介入的態度，與比較政治學者「在專業言專業」是有不同的。

本節的討論，在前半部先分析了政治人類學者過去對邦國形成的論述，指出這些論述歷經了基本分類、起源、象徵意義、邦國與經濟等的變化。從後半部起，我先討論自 1970 年代以來，比較政治學者著眼於經濟發展進程與特定政權形態之間關係的探討。但是在工業深化相應於（以軍人技術官僚為主的）BA 政權無法得到南美及東亞證據的支持之後，學者轉向國家自身的「能力」與「自主」的討論。針對這種「恢復國家定位」架構的研究議題，1990 年代主張「社會中的國家」的學者指出，即使只設定在「國家能力」與「國家自主」的討論，為免於對國家能力的高估，甚至對國家概念的天真認知，都有必要帶入社會及社會與國家介面的考慮。

¹⁵¹ Chris Hann, "Introduction: Political Society and Civil Anthropology," in Chris Hann and Elizabeth Dunn, eds., *Civil Society: Challenging Western Model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3-6.

¹⁵² *Ibid.*, p.22.

而「社會中的國家」架構發展出對第三世界市民社會的研究課題，經由與人類學者相關討論的對比，我認為有可能成為兩個學門對話的基礎。即，政治學者著重第三世界市民社會制度、過程的研究，而人類學者著重該社會理念、德目的研究，並與西方的個人主義市民社會做對照。我也認為，有必要進行這種對話的背景，則是人類已處身全球化、網路化的世界體系，並將邁入二十一世紀，能鼓吹文化合作、互信的研究，都應該受到學術社群的重視。

五、結 論

二十世紀中期的政治人類學，從 1940 至 1974 年間，主要是由英國出身的人類學者所發展出來的。他們在結構功能理論的指引下，針對過去英國殖民地原住民政治文化的鉅觀與微觀現象，以有機體的系統、均衡語言或歷史事件的時期、場域概念，逐漸開展出重視鉅觀現象的體系分析取向（以 1940 年出版的非洲政治體系論文集為集大成），及重視微觀現象的過程分析取向（以 Turner, Cohen, 及 Barth 為此中翹楚）。

但是，早期的體系論者多不自覺，他們在異民族的研究工作之所以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已經是英國資本主義擴張下的既得利益者。對自身結構位置的忽視使得體系論者可以置殖民母國對土著的政經影響於不顧，而把土著社會描繪成一個自足的、勢力均衡的、純依內在的分支原則演變的「體系」。屬過程取向的曼徹斯特學派學者，對所處結構位置的優越性有初步的覺醒，所以他們發展了帶有衝突觀點的個體政治行為分析。在這個領域內，過程取向學者創造了豐富的理論語彙-社會劇、象徵、領域-情境、雙聲帶等等。這種理論語彙不但預設了某種結構整體的存在使得個體的互動過程可被理解，整個取向也試圖去整合微觀的行為分析和鉅觀的體系分析。

但是英國過程取向學者的努力，必須加入 1974 年以後，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之美國學者的心血，才得出較令人滿意的結果。也就是說，先有 Wallerstein 及結構馬克思主義者的互動，把自足的本土「體系」擴張到涵

蓋全球，或者被「生產模式」所取代；後有 Marcus 在民族誌研究上的澄清，肯定本土生產模式的架構最足以同時解決鉅觀與微觀的連接問題，才有 Scott 分析 Sedaka「弱者的武器」所表現的民族誌的優點。

進入 1990 年代的政治人類學，我們以邦國形成的議題做代表，因為在這一議題上，我們看到了政治人類學者及比較政治學者，或平行或合作努力的契機。政治人類學者對邦國形成的論述，指出這個議題歷經了基本分類、起源、象徵意義、邦國與經濟等的變化；從邦國/無邦國型社會的分野到「邦國的經濟人類學」，政治人類學學科的發展始終沒有減少對邦國形成議題的興趣，只是隨著理論取向的轉移，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切入邦國的現象。

自 1970 年代以來，比較政治學者著眼於探討南美工業化與科層威權政體興起的關係；國家自身的「能力」與「自主」的討論；及 1990 年代「社會中的國家」的學者所指出的，為避免高估國家能力，或淺薄認知國家的概念，都有必要帶入社會及社會與國家介面的考慮。但是最重要的，卻是他們最近對第三世界市民社會的研究。因為透過與人類學者相關討論的對比，我們認為這個議題有可能成為兩個學門對話的基礎。也就是說，政治學者著重第三世界市民社會制度、過程的研究，而人類學者著重該社會理念、德目的研究，並與西方的個人主義市民社會做對照。政治人類學者與政治學者進行這種對話，不但是應該鼓勵的，而且這也反映了這個時代精神：今日人類已處身全球化、網路化的世界體系，並將邁入新的千禧年，任何能夠鼓吹文化合作、互信的研究，都應該受到學術社群的重視。

參考書目

- 方孝謙，1994，「殖民地民族主義與 1920 年代的日治台灣」，**東吳社會學報**，3: 161-197。
-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公司。
- 陳文德，1992，「結構功能論大師 芮克里夫布朗」，載於黃應貴編，**見證與詮釋：當代人類學家**，台北：正中書局。
- 黃應貴，1998，「『政治』與文化：柬埔寨布農人的例子」，**台灣政治學刊**，3: 115-193。
- 蔣斌，1992，「人文主義的社會人類學家 伊凡·普理查」，載於黃應貴編，**見證與詮釋：當代人類學家**，台北：正中書局。
-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 1998.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World*. London: Verso.
- Asad, T. 1973. "Two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Rule." In Talal Asad ed.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 . 1979. Anthrop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Ideology. *Man* (N.S.) 14: 607-627.
- Balibar, E. and Wallerstein, I. 1991.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Verso.
- Barth, F. 1959. Segmentary Opposi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A Study of Patnan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9: 5-21.
- . 1966. *Model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London: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 Brenner, R. 1986. "The Social Ba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ohn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umfiel, E. M. 1994. "The Economic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An Introduction." In Elizabeth M. Brumfiel ed. *The Economic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Cardoso, F. H. and Faletto, E.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Trans. Marjory Mattingly Urquid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se-Dunn, C. 1985. 「國際體系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一個邏輯抑是兩個邏輯？」載於於蕭新煌編，**低度發展與發展：發展社會學選讀**，台北：巨流，頁 377-401。
- Claessen, H. J. M. and Skalnik P. 1978a. "The Early State: Theories and Hypotheses." In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eds., *The Early State*.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 . 1978b. "Limits: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Early State." In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eds., *The Early State*.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 . 1981. "Ubi sumus? The Study of the State: Conference in Retrospect." In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eds., *The Study of the State*.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A. 1974. *Two-Dimensional Man: An Essay on the Anthropology of Power and Symbolism in Complex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79. Political Symbolis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8:87-113.
- Cohen, A. P. 1975. *The Management of Myths: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in a Newfoundland Community*.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 Cohen, R. 1973.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J. J. Honigmann ed. *Handbook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 . 1978. "Introduction." In R. Cohen and E. R. Services eds., *Origins of the State: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al Evolution*.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 Collier, D. 1979. Overview of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Model. In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maroff, J. L. and Roberts, S. 1981. *Rules and Processes: The Cultural Logic of*

- Dispute in an African Contex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rrigan, P. and Sayer, D. 1985. *The Great Arch: English State Formation as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Duara, P.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ley, G. and Suny, R. G. eds. 1996.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P. 1979.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1985. 「超越核心和邊陲：評世界體系理論」，載於蕭新煌編，**低度發展與發展：發展社會學選讀**，台北：巨流，頁 423-433。
- . 1987. "Class, State, and Dependence in East Asia: Lessons for Latin Americanists." In Deyo, Frederic C, ed.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P. B. et al.,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aston, D. 1959.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B. J. Siegel ed., *Bienni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Evans-Pritchard, E. E. 1940. "The Nuer of the Southern Sudan." In M. Fortes and E. E. Evans-Pritchard eds.,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KPI.
- Fortes, M. and Evans-Pritchard, E. E. 1940. "Introduction." In M. Fortes and E. E. Evans-Pritchard, eds.,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KPI.
- Gledhill, J. 1994. *Power and Its Disguis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London: Pluto Press.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 . 1980.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llner, 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luckman, M. 1940. "The Kingdom of the Zulu of South Africa." In M. Fortes and E. E. Evans-Pritchard eds.,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KPI.
- . 1955. *Custom and Conflict in Africa*.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 1963. *Order and Rebellion in Tribal Africa*.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Greenough, P. R. 1983. "Indulgence and Abundance as Asian Peasant Values: A Bengali Case in Poi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 831-850.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Hall, J. A. ed. 1998.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nn, C. 1996. "Introduction: Political Society and Civil Anthropology." In C. Hann and E. Dunn eds., *Civil Society: Challenging Western Models*. London: Routledge.
- Hirschman, A. O. 1979. "The Turn to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Search for Its Economic Determinants." In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pkins, T. K. and Wallerstein, I. 1982.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n T. K. Hopkins et al. eds., *World-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Beverly Hills: Sage.
- Hoogvelt, A. 1997.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S. M. (黃樹民) (1994) [1989] *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後的中國農村變革 (The Spiral Road: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 素蘭譯, 台北：張老師出版社。
- Johnson, C. 1982. *Revolutionary Change*. 2nd 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ufman, R. R. 1979. "Industrial Change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Latin America: A Concrete Review of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Model." In David Collier ed.,

-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ys, C. F. 1983. "Introduction: Peasant Strategies in Asian Societies: Moral and Rational Economic Approaches-A Symposiu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 753-768.
- Kohli, A. and Shue, V. 1994.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On Political Conten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In J. S. Migdal et al.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ach, E. R. 1954.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 . 1976 [1970] *結構主義之父·李維史陀* (Levi-Strauss), 黃道琳譯。台北：桂冠。
- McGlynn, F. and Tuden, A. eds. 1991.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Behavior*. Pittsburgh: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MacIntyre, A. 1984.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2nd ed.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Marcus, G. E. 1986.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Ethnography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n 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igdal, J. S. 1994. "The State in Society: An Approach to Struggles for Domination." In J. S. Migdal et al.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gdal, J. S. et al. eds. 1994.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 C. 1994. [1990]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劉瑞華譯, 台北：時報文化。
- Ogburn, W. F. 1965. "The Hypothesis of Cultural Lag." In T. Parsons et al. eds., *Theories of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 O'Donnell, G. A. 1973.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 1978. "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3: 3-38.
- Oi, J. C. 1999.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aine, R. B. P. 1974. Second Thoughts about Barth's Models.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32. London.
- Polanyi, K. 1957.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K. Polanyi et al.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Chicago: Henry Regnery.
- Polachek, J. 1983.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Kiangsi Sovie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 805-829.
- Popkin, S. L. 1979.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dcliffe-Brown, A. R., 1940. "Preface." In M. Fortes and E. E. Evans-Pritchard eds.,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KPI.
- Ricoeur, P. 1976. *Interpretation Theory: 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 Fort Worth: The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 . 1991. Life in Quest of Narrative. In David Wood ed.,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Routledge.
- . 1992. *Oneself as Anoth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saldo, R. 1986. "From the Door of His Tent: The Fieldworker and the Inquisitor." In 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seberry, W. 1989. *Anthropologies and Histories: Essays in Culture,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Rueschemeyer, D. and Evans, P. B. 1985. "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oward an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Underlying Effective Intervention." In P. B.

- Evans et a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neider, J. 1995. "Introduction: The Analytic Strategies of Eric R. Wolf." In J. Schneider and R. Rapp eds., *Articulating Hidden Histories: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Eric R. Wolf*.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ott, J. C.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77. "Hegemony and the Peasantry." *Politics and Society* 7: 267-296.
- . 1979.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Peasants and Commissars." *Theory and Society* 7: 97-134.
- .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erra, J. 1979. "Three Mistaken Theses Regar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 1979.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5a [1977] 「論Wallerstein 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理論與歷史的批判」(Wallerstein's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 Theoretical Critique)。載於蕭新煌編，*低度發展與發展：發展社會學選讀*，台北：巨流，頁403-422。
- . 1985b.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 B. Evans et a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 A. Y. 蘇耀昌. 1986. *The South China Silk District: Local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World-System The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tark, D. and Bruszt, L. 1998. *Postsocialist Pathway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wartz, M. J. et al. 1966. "Introduction." In Swartz, M. J. et al. eds., *Political Anthropology*. Chicago: Aldine.
- Turner, V. W. 1967. *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74. *Drama, Fields,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incent, J. 1978. "Political Anthropology: Manipulative Strategies."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3: 42-52.

----. 1986. "Systems and Processes, 1974-1985."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5: 99-119.

----. 1990.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Vision, Tradition, and Trends*.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Wallerstein, I. 1976.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79 [1974]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Essays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rd, B. E. 1967. "Review of 'Model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by F. Barth." *Man* (N. S.) 2: 316.

Wolf, E. R. 1969.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71. "Peasant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In N. Miller and R. Aya eds., *National Liberation: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9. *Envisioning Power: Ideologies of Dominance and Cri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